

之十五左右（反动的是极少数的），学生已经是一边倒，不是进步就是落后或坚持反动，中间状态基本上已不存在，而落后分子甚至反动分子，现在亦还在不断分化中，其结果，大多数学生的政治面貌，大体上是弄清楚了（但仍有小部分死角未突开，也有伪装进步、假造历史隐藏着的）。青年团员的发展已超过四千人，共产党员发展了二百人。学校宣布提前毕业后，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学生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工作，到工作岗位上去学习与锻炼，始终保持着饱满的革命热情。

（三）基于学生情况的特点与上级的启示，我们采取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为本校基本教育方针，把学校作为“思想战场”或“政治工场”来办事。故应以系统地进行马列主义最基本的理论与思想教育为中心。既反对脱离思想实际的空洞的教条主义的教育，也反对零碎的片断的忽视理论学习的经验主义的教育；把理论学习作为改造思想的武器，把改造思想作为理论教育的直接目的，两者要密切结合，有步骤、有计划、有重点的实施。课程以少而精为原则，总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其中又以三个问题为主题，即劳动创造世界、阶级斗争和国家学说，配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及政治形势、国际主义、党史党纲党章等学习。在系统地进行了以上教育之后，绝大多数学生陈旧的脑筋即已基本打开，改变了看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步一步地靠拢了我们。经验证明：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要改造成成分与思想都极为复杂的旧知识分子，必须把一切教育力量集中起来，环绕改造思想的中心任务。而改造思想的基本关键，就在于确立革命的人生观。不要分散力量，不要忙于去讲政策（政策教育最好放在工作部门中去讲），或平列许多政治课程，以免面面俱到、先后倒置、失去中心、多走弯路。

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思想改造，除以理论教育与思想实际相结合来启发学生内在的思想斗争，从根本上摧毁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外，我们还着重了劳动的实际的锻炼与教育，由干部带头，全体学生一律参加劳动，种菜、掏井、挖水沟、打扫楼院及厕所，并参加帮厨、修桥等劳动。利用“五一”劳动节，进行了尊重劳动人民的教育。从此掀起了普遍的劳动热潮，改变了知识分子轻视劳动与对劳动人民的自高自大的错误观点，转而积极从事劳动，并开始了解劳动人民的可贵。大多数学生实际体会到劳动创造世界是科学的真理，无论对青年学生或公教人员，印象均极深刻，而工人更受到极大的感动。每上一次劳动课，就引起了他们的诉苦，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经验证明：实际的劳动教育，在一切改造知识分子的学校、训练班中，都有设立的必要。这一点在教育方针上必须加以明确的规定。

（四）讲授是重要的教学方式。在讲授方法上，我校差不多完全是采用上大课形式，经常是七八千甚至一万多人听讲，分班讲授几乎没有过。在革命大学这样性质——以政治与思想教育为唯一中心的学校，共有一万二千多学生这样大的学校，而训练时间又只是三个月的情况，讲大课可以说是唯一适宜的形式。因为第一，全校共有五十多班，要同时请很多在理论上、政治上均有修养的负责同志和教员逐班讲授，事实上是办不到的；第二，由某些在理论上、政治上修养较好的少数负责同志或教员逐班轮授，在他们的时间上也是不允许的；第三，在上述两种办法行不通时，如不采取上大课办法，就只好由一些普通同志分班讲授，这在教学效果上说，显然是相差很多的。上大课，就可以解决这个好教员少而学生太多的矛盾。但是上大课也有它的缺陷，由于听讲人数太多，时间较长，特别

是学生的程度的参差不齐，必然会产生接受程度的差异。为了补救这种缺陷，我们又普遍运用了助教与班联课即跟班联合讲授的办法。这些助教就是马列学院的学生及本校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教员。这些助教的任务，就是根据上大课时所讲的内容，在班联课中向学生做进一步的解释、说明，帮助学生领会讲授内容。大课讲授和班联课助教的讲授相结合，就是我校讲授的基本办法。

但只靠教员由上而下的讲授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学生自己的学习组织，组织与推动学习。也就是说，必须与群众路线相结合。讲好是重要的，但还须着重地注意组织大多数同学，启发其积极性，提高其觉悟。只注意讲授，忽视学生群众的自觉活动是不对的，但在组织学生的学习活动时，也不要把手眼光注视到几个少数人，更不要只啃硬骨头，这样做也是不对的。经验证明：只要大多数同学觉悟、进步、团结起来了，就能带起落后，孤立反动分子。不要只看到几个少数反动分子，就把全班全组看成漆黑一团，不相信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思想斗争，甚至害怕群众斗争，认为越斗争，少数人的问题越不好搞。就是因为这种不相信群众力量的错误观点，造成了个别死角长期不能突破。在群众初步发动的基础上，应适时的组织学习代表会和代表小组，这是使领导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经常联系群众的最好的方式。凡是学代会组织起来的地方，同学们的情况反映就很及时，帮助领导上分析处理问题，可以防止小组长的独断专行，可以不断的发现与培养骨干。这种学习代表会可由班到部以至全校统统组织起来，效果甚好。广大的年青妇女，都应当适时的组织起来（学校成立了女生指导委员会）。这些先进青年和妇女，一旦觉悟与组织起来，他们在学习与工作中就能起很大作用。这次理论测验与思想总结

中，充分的发挥了青年团与妇女的积极推动作用。

学习一个段落即举行一次测验，采取民主评卷办法，由教务处统一出题，发统一的标准答案，以小组为单位，挑选中等典型试卷，作为评定的标准；实行自报公议、分析批评，然后再打分数（但反对争分数），同学们都认为公平满意。这是最生动最活泼的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种办法，也是群众路线最集中的一种表现。这次搞思想总结，也是采取这种群众路线的办法来进行的。

（五）提倡忠诚老实、实事求是、言行一致、表里一致。从每周生活检讨会开始，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同学们逐渐善于使用这个武器，由日常生活的检讨提高到思想原则水平。过去同学们隐瞒历史成分和罪恶行为，在自我检讨过程中，逐渐自动坦白了，放下包袱。这次我们举行了半个月的理论测验与思想总结，实际上是整风的一个新形式。我们的经验是：在学完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后，需要来一次思想的清算运动，对于反动的落后的思想，作一番更深刻更切实的批评、揭发与清除，以便进一步地巩固已得成绩。思想的清算，必须遵守下列原则：一、理论测验与思想检查的实际相结合；二、自觉自愿，不追不逼；三、友爱互助，实事求是，分析批评；四、提高多数，带动少数。基本上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民主评定。结果大多数人放下了包袱（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党派问题，只有少数是特务与严重的政治问题）。相当普遍的得到了改造与提高，剩下少数的垃圾堆，也就便于清理了。这一个经验，也证明过去整风审干的方针是正确的。只要采取严肃的方针，实事求是的态度与自觉自愿的方法，辅之以互助友爱、分析批评，在运动中及时提出防“左”，就不致犯错误。在这次运动中，也曾有过个别“左”

的倾向，已随时加以纠正了；也有极个别的同学，在群众思想运动的高潮中胆战心惊，开小差，装病，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这些情况，有的是很难避免的。还有假装要跳水寻死的，这些现象是个别的，也值得我们加以检讨。

（六）此次一万二千多学生，其中绝大部分能够在短期内得到改造与提高，是由于中央与华北局有明确的教育方针，我们有过去整风审干整党的经验，与许多负责同志（如薄一波、董必武、彭真、安子文、黄敬、冯文彬、艾思奇、杨献珍诸同志）亲自上课及全校党员、干部刻苦的努力所造成，而全国胜利的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正确的教育方针与主观的努力仍是收效最大最快的决定的条件。我校干部理论水平不高，也缺少教育经验，但其中多数是长期作党的工作的，经过整风审干整党，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纯正朴素的工作作风，与群众生活能打成一片，能贯彻党的思想领导，因而在学生中威信很高，这在改造旧的知识分子中也是重要的经验。

（七）开始我们曾计划选择一批专门人才、大学教授、中学教员等加以比较长期的培养，成立一个高级班（一百六十余人）。这些人文化水平高是其长处，但社会经验复杂，思想比较落后，接受马列主义的理论与思想比较困难。且其中绝大部分是失业分子，有许多伪造历史，耍两面派手腕，个别搞特务活动，故在学习中不易展开思想斗争，进步很慢。在这次思想总结与鉴定后，班里还不断的发现了他们的政治问题，这证明单纯的按文化技术观点分班的办法是有毛病的。正确的方针，应当把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他们思想多不纯洁，有复杂的社会经验）分别编入文化较低、思想纯正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占优势班内，进行改造，这样的效果是会比较好一些。或者

是将这一批有专门技术的与文化水平较高的学生，给以较长期的教育，其结果也会更好一些。这也是我们所得到的几点教训。

刘澜涛 胡锡奎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争取程潜等站在 我们方面给华中局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八月六日)

华中局，并转湖南省委：

(一) 林邓五日十二时电^{〔1〕}悉，处置甚好。

(二) 我军人长沙后，除反动报纸应当准备封闭外，程潜系统的报纸不应封闭，以便利用这种报纸，登载我们的消息及文件，分化程潜、陈明仁系统中的党、政、军，给进步分子以武器，教育和争取多数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同时请湖南工委和程潜商量，如果他在新化有报纸，希望他指示该报采用新华社稿件，以为团结和教育程部党、政、军多数人员，打击反动分子的工具。

(三) 请你们考虑物色若干程潜系统中的开明分子，在程潜及本人同意的条件下，任命他们为长沙军管会的顾问。如果你们认为可行，请即进行物色，并拟定名单电告。

(四) 争取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站在我们方面，对于分化台湾、广州、广西、昆明、四川等地国民党特别是分化台湾及宋希濂等部有极大的政治作用，对于顺利地接管湖南及改造程、陈系统则有直接作用。你们对此要当作一件重要工作去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做。程潜的临时机构，不忙很快取消，省政府接交可以推延一个月左右，使程潜有时间在其内部进行教育工作，利于将来的改编和改造。

（五）在将来接收省政府及改编军队时，除陈明仁应任军职外，应给程潜及其一派中的开明分子以位置，并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其办法为组织湖南军政委员会，由两方面的人成立，以程潜为主席，以我们的人为副主席，湖南省政府亦照此方式组织，成为统一战线的临时过渡机构。此办法是否可行，请你们先作考虑，惟暂不对外透露，看一看程潜及其一派人的表现如何，再作决定。

中 央

未鱼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指林彪、邓子恢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十二时给金明、唐天际等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我们目前不要急切地进行对陈明仁的斗争，而以热烈的团结为主，便于今后商谈一切问题。政权要其逐步移交，名义上推迟一个月。岳麓山的控制和长沙部队的指挥关系，如目前不能立即解决，待见面后逐步解决亦可，但必须达到解决的目的。

毛泽东关于兼取政治方式解决 西北地区给彭德怀等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八月六日)

德怀同志并贺习^{〔1〕}：

(一) 现在西北敌军分向汉中、兰州、宁夏三处退却，我军亦须分为三路解决退敌。你们准备如何部署？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对此你们有何意见？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办法即用靠拢我们的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以为临时过渡机构。这样的国民党人就是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

(二) 关于绥远和宁夏问题，我们准备和傅作义合作去解决。因为绥远反动分子受阎锡山及美帝勾结极为猖獗，傅的部下董其武等愿意靠拢我方，但是尚无惩办反动分子、改造部队的决心，而傅作义则已开始建立此项决心，并建议早日解决绥远问题，而不要再拖下去。故我们决定组织绥远军政委员会，以傅为主席，我们的高克林为副主席，委员十余人，傅部占多数，我们的人占少数。以傅部五万人，我军姚喆、王平两部二万人合编为两个军，以傅部董其武等为军长，我们的人为副军

长。实行人民解放军的军政制度，汰坏留好，逐步改造。两个绥远省政府合而为一，以傅部董其武为主席，我们的杨植霖为副主席，省府委员亦用双方的人作适当配备。此项办法对双方都有利益，可以经过一个工作过程，达到彻底改造之目的。傅作义对此项办法表示满意，拟于数日后即令傅去绥远，和我们的人一道解决绥远问题。

（三）马鸿逵是傅作义的把兄弟，马派马如龙及哈某至绥远接洽，有请求和平解决之意。傅作义说马极愿求和，只恐求之不得。请你们对宁夏问题考虑一下，是否可以经过傅作义去改编马鸿逵部。我们认为在马步芳解决后，必须使用杨得志兵团深入宁夏，给马鸿逵部以歼灭的打击，迫使残部退入后套，然后经过傅作义用政治方式去解决。

（四）邓宝珊与马步芳将领均认识，于甘肃有声望，他是一个光杆，没有多少干部，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用邓宝珊，叫他去兰州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甘青军政委员会及甘肃省府。此两机构均以邓为主席，赵寿山、王世泰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对马步芳必须歼灭其主力，但他有玉树等地为后方，可以保存残部。欲最后解决青海亦须找些与青海有联系的旧人，如我们使用邓宝珊主甘，可能打开寻找此项旧人及最后解决青海问题的门路。此外，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五）陶峙岳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我们认为应用张治中组织新疆军政委员会，以张治中为主席，我们的人（是否王震去新疆）为副主席，再加伊犁方面一人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

（六）过渡机构存在时间究有多久，暂不作硬性规定，以

便利解决反动军队及反动政权，便利解决土地问题及民族问题为原则。

（七）胡公冕已来西安，请你们注意用他去收拾胡宗南部。现在程潜、陈明仁已在湖南起义加入我方，对蒋^{〔2〕}、桂、胡各部必有影响，给我们以分化各部的机会。

（八）整个西北亦可考虑在将来组织军政委员会，以彭为正，以张治中为副。

（九）以上各项是否可行，请加考虑提出意见为盼。

毛 泽 东

午鱼^{〔3〕}

此报加发华中局，湖南省委，刘邓张李^{〔4〕}，华东局及粟裕。请你们注意研究此项问题，并应用此项方法于湖南等处。毛又及。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指贺龙、习仲勋。

〔2〕指蒋介石。

〔3〕“午鱼”，应为“未鱼”，即八月六日。

〔4〕指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

中共中央关于 同意以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解决河南土地问题 给华中局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日)

华中局，并告各局，各野：

八月六日电及转来河南省委八月一日电均悉。我们同意以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作为解决河南土地问题的基点，对中农土地完全不动，而不要照土地法大纲上关于中农土地的规定。在中央政府成立后，土地法大纲须要有所修改。除上述一点外，在南方及其他新区实行改革土地制度时，必须在某些政策上（例如不要使地富扫地出门等）及工作方法上（例如要开区乡农民代表会议等）改正过去在北方土改中做得不好的地方。而且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完全掌握全部农村运动的领导，绝不许再有过去那样无政府无纪律的状态出现。除河南等若干地方外，最广大的新区，今年及明年的全年都不是实行分配土地的时期，而是准备分配土地的时期。但就在此准备期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省委、区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党委必须完全掌握农村工作的领导职务，千万不要放松此种职务。一切重大决定，均须事先报告中央，获得批准然后实行。

八月十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无可奈何的供状

——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新华社社论）

美国国务院在本月五日发表的名为“中美关系”的冗长的白皮书和其他有关的资料，其主要内容现在已经为中国人民所知。从美国政府的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声明中，中国人民应该得到什么教训呢？

应该得到的第一个和最基本的教训，就是美国帝国主义政府对于中国民族利益和中国人民民主力量的根深蒂固的敌视。美国白皮书毫不掩饰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立场。美国政府公然厚颜的宣称“不干涉中国内政”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与“支持中国的统一与领土完整”“发生了冲突”。换句话说，美国政府认为必须干涉中国内政，必须把中国看作美国的保护国，然后中国才能有所谓“统一与领土完整”！根据这种希特勒主义的武断，美国政府尽管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党是一群“与过去军阀并无区别的反动分子”，因而他们的政府“已经失去人民的支持”，但是“为了显见的理由，仍旧继续倾全力援助”它，使它“尽可能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上建立其权威”。究竟是“为了什么显见的理由”呢？美国政府给予这个反动的不受人民支持的政府以“较美国对其他任何国家的援助数量为大”的援助，等于这个反动政府的“金钱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美国政府究竟是为着什么奥妙的“友谊的”目的，“在运输武装和补给上”给予一个反动的而且本身已经“丧失了斗志”的军队以如此巨大的援助，供给了它的“军需品的大部分”，致使其竟能一度用战争的方法（记着：这在美国政府就叫做“鼓励双方从事协商，力求避免内战的发生”！）“推广其控制及于华北和东北的大部分”呢？凡是一个头脑清醒而有最低限度的推理能力的人，都不能不由此得到结论：美国政府是坚决地一贯地抱着侵略中国的目的。美国政府之所以看来毫无理由地援助一个不受人民支持的反动政府及其反动军队，来进攻中国的拒绝支持反动统治的广大人民，是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理由”的，这个“理由”就是：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既然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和中国民族的权益，美国政府就不可能指望得到中国人民的合作，就不可能不专横地干涉中国内政，以使用军事方法在中国建立一个可以与美国政府“合作”的季里诺式的卖国傀儡政府。难道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解释吗？

白皮书徒然地伪善地说了一大堆中美的友谊。这种友谊确是存在的，而且将永远继续存在，但是它只存在在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因为美国人民没有侵略中国的动机和必要，并且曾在许多方面与中国人民作了令人永志不忘的互相援助。至于美国政府的侵略行为，甚至艾奇逊也不能不承认这是美国人民所“显然不会允许”的。艾奇逊在致杜鲁门的信中写道：美国今天如果采取进一步的干涉，则“势将引起中国民众的愤慨，并将受到美国人民的谴责”。多奇怪！如果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确是抱着友好态度，为什么扩大这种友谊的范围和广度（比方说，如果美国政府曾在抗日战争期间援助中国人民而不是援助中国人民所反对的恶政府），就会引起这种友谊的一

方的愤慨和他方的谴责呢？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美国政府所抱的并不是什么友谊，而只是令人愤慨和必须谴责的侵略野心吗？既然如此，难道规定了这种侵略野心的范围和广度（比方说，日本侵略者不占领延安和重庆而停止在黄河东岸和贵州南部），就会叫人们停止愤慨和谴责了吗？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们妄想全世界都是愚蠢的，但是结果表明，真正愚蠢的只是他们自己。

而事实上美国政府又是怎样规定自己的侵略的范围和广度的呢？帝国主义者按照独占资本的要求所要求的扩张是不知道止境的；如果有什么止境，决不是因为畏惧人们的愤慨和谴责，愤慨和谴责的纪录难道不是已经堆积得比白皮书还要厚吗？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自己的力量有所不能。关于美国政府援助国民党得到什么结果，艾奇逊写道：“我们的援助与鼓励，曾帮助他们抵抗。不幸的但亦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不幸结果为美国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国在她能力的合理限度之内，所曾经做或能够做的都不能改变这个结果。美国所未做的对于这个结果也没有影响。这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这些势力，美国亦曾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看吧！这就是美国的贪得无厌的但是终于失败了的干涉者和侵略者向全世界所作的有益的供状！只有坚决的有效的斗争，将帝国主义者彻底地打败和打倒，帝国主义者的脚步就停止了，而到最后，帝国主义这个废物就被消灭了。

但是今天的问题是：干涉者和侵略者在中国是就此干休了吗？不，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的野心仍然是没有止境的。“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句格言并不能一般地适用于帝国主义者。尽管美国政府对于利用蒋介石国民党这个工具如何失望，但是只要国民党反动派还有一兵一卒或一个特务分子存在，美

国政府就决不会中止加以利用。同一个艾奇逊在一个月以前，在七月六日还声明：“美国正向国民党中国输送它现在确能办到的一切经济援助。”但是即令对于国民党的心是死了，美国政府对于继续干涉和侵略中国，继续破坏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的心，却是不会死的。艾奇逊已经明目张胆地宣布：一切反对“中国内部势力”在今日所已经达成的人民民主政治的“发展”，都将受到美国政府的“鼓励”。艾奇逊并在白皮书公布的第二天即八月六日发表专门的声明，提出他的所谓五项原则，如果把这些原则不用骗术而用科学加以解释，那就是：（一）美国政府愿以每一可行之途径，鼓励凡能促中国成为美国殖民地之发展，俾能在国际事务中担任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之傀儡的任务。（二）美国政府愿协助中国建立一种经济与政治之环境，可保障美国帝国主义代理人之人权与自由，并可逐步地发展美国的殖民地经济与买办阶级的福利。（三）美国政府反对中国脱离其干涉而独立，反对任何一个不服役于美国独占资本利益之政权。美国政府反对任何外国以平等友好态度援助中国。（四）美国政府将继续与其他殖民于远东的帝国主义国家参照有关各国与整个远东之局势，咨商将有助于各该国在远东继续保持帝国主义特权之办法。（五）美国将强迫联合国达成上述目标，特别是有关维持帝国主义对远东侵略之努力。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决定继续从内部破坏人民民主的中国，并从外部压迫人民民主的中国。由此可见，只要美国仍然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没有变为人民的国家，美国政府就决意敌视中国人民到底。

中国人民至今只是努力恢复和保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从没有派一个兵或一个顾问，远渡重洋，到美国去干涉该国“内部势力”的发展，去支持该国的“统一与领土完整”，这难道不

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吗？然而美国帝国主义却要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干涉中国，破坏中国人民的伟大爱国运动，强迫中国隶属于美国帝国主义，服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利益，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吗？因此，美国帝国主义是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不可调和的仇敌，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吗？

因此，中国人民应该从美国白皮书得到的第二个教训，就是中国人民必须继续抵抗和防备敌人美国帝国主义的任何干涉和挑战，必须不堕入敌人美国帝国主义所设的任何陷阱。凡是敌人所害怕的，我们一定要做，凡是敌人所喜欢的，我们一定不要做。美国侵略者号召某些中国人（按照艾奇逊的话，这些人叫做“民主的个人主义者”），组织反共派别，借以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美国侵略者妄想在中国人民的经济困难面前利用某种暂时的表面的物质“援助”来勾引中国人民饮鸩止渴，放弃独立，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美国侵略者妄想挑拨中国人民与苏联的兄弟友谊，借以分化远东和世界的反帝国主义反侵略的同盟，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

美国白皮书在美国人民、中国人民、世界人民面前散布了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种种荒谬的恶毒污蔑，例如说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不努力，例如说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的国内和平不努力，例如说中国共产党“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与此同时，则竭力冲淡国民党的罪恶，并将美国侵略者在白日梦中所描绘的比国民党有用些的某种新工具称为中国的“民主政治的脊骨”等等。但是这些奇谈简直是幼

稚到不值一驳。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真相，就已经被许多在中国的美国观察者，包括史迪威将军这样的人物，报告给美国人民了。艾奇逊断言，“在不久的过去，外国之企图控制中国，在中国人民看来，很清楚地就是外来的侵略，因此就遭到严肃的抵抗。”艾奇逊在这里的头脑，似乎还有些清醒之处。但是他接着断言，世界忽然大变了，这些严肃的抵抗者们自己忽然“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了；过一会儿（大概是一分钟），中国人民又忽然不赞成这种说法，而是“显然地认为具有它的土生性和国家性”了；倒是美国政府所努力帮助其恢复“主权”的国民党，被公认为“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而且中国人民老实不客气地指明这个外国帝国主义，首先就是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之流所代表的美国帝国主义。

美国帝国主义之企图控制中国，在中国人民看来，很清楚地就是外来的侵略，因此就遭到严肃的抵抗。另一件事也是中国人民很清楚地看到的，这就是苏联并没有干涉中国内政。甚至艾奇逊自己也不能不承认，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而中国内战双方的“军需品的大部分”都是美国供给的。那么，关于谁是侵略者及其代理人的问题，究竟是因失败而昏迷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看得清楚些呢？还是有数十年如一日的爱国立场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看得清楚些？毫无疑问，艾奇逊尽管自己欣赏自己的自相矛盾的天才，却决不能使世界信服，决不能动摇中国人民对于客观真理的坚定信念于万一。

美国白皮书也攻击了国民党，其目的之一是诱使人们以为美国政府究竟也有一些客观态度。但是白皮书是为什么而攻击国民党的呢？这是侵略者对于他的走狗的攻击，犹如日本侵略

者对于汪精卫的攻击。正如艾奇逊所说，攻击了国民党的魏德迈的报告，仍然是“对国民政府的各项问题表示同情”的。同情，但是不满，因为国民党“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得不好，致使帝国主义援助归于无效，致使帝国主义利益归于灭亡。严格地说，美国侵略者对于国民党的攻击是不公平的，因为第一，国民党的反动无一不因美国政府“援助与鼓励”而加深，没有美国政府的“援助与鼓励”，国民党是不敢惹出这样滔天大祸的；第二，国民党的腐败是随着它的反动而来的，并且这种腐败至少也因美国的榜样而加深。广州的国民党报纸在本月十日说得对：“美政府指责中国（国民党）官员贪污舞弊，此为不可否认之事实。但美国派来中国之人员，其贪污程度比诸中国官僚亦无不及。如战后之‘善后救济’事宜及近年之‘经济合作’等工作过程中，美籍人员之贪污舞弊事实诚不可胜数。”螃蟹责备它的儿子横行，莎士比亚喜剧中的丑鬼卡立班痛恨他在镜子里的尊容难看，这就是美国白皮书谴责国民党的真正意义。

总之，从根本上说来，美国白皮书确是一部颠倒黑白的杰作，这种颠倒黑白如果加以再颠倒，人们是可以从中获得种种有益的教训的。中国人民由美国白皮书进一步认识了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面貌，进一步认识了应该如何向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最后，还可以由此进一步认识这一斗争的前途。白皮书是美国帝国主义反动政策在中国惨败的史册，因此它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艾奇逊说：国民党的“貌似强大的力量是弱的，他们的胜利建立在沙上”。完全正确，可是必须补充说，美国帝国主义者自己以及任何国家的反动派的“貌似强大的力量”都是弱的，他们的暂时的猖獗的基础也都是“建立在沙上”，或者更准确些说，

建立在火山上。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从中国事件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因此，美国政府仍然要在中国国内外继续征募各种色彩的破坏分子来捣乱中国人民的庄严美丽的祖国，来捣乱苏联和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来捣乱东方和西方的和平。在中国事变中真正得到了教训的首先是中国人民自己。我们相信我们的曾经貌似弱小的力量是强的，因为我们的力量生根在中国人民中间，同时也生根在各国人民的国际主义团结中间。我们既然战胜了为一千零五十四页的白皮书所见证的过去的困难，我们也必能战胜任何新的白皮书所将要恫吓的困难。美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任何白皮书，将只能无可奈何地判决自己的失败，并且无可奈何地证实中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的胜利。

根据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刊印。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

毛 泽 东

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不是偶然的。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国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重重，无法克服，使帝国主义者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中。

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就是这样的条件。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

帝国主义替这些人民大众准备了物质条件，也准备了精神条件。

工厂、铁道、枪炮等等，这些是物质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的物质装备，大部分是从美国帝国主义得来的，一部分是从日本帝国主义得来的，一部分是自己制造的。

自从一八四〇年英国人侵略中国以来，接着就是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法国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进攻中国的战争，英国、法国、日本、沙皇俄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奥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地利等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和沙皇俄国在中国领土内进行的战争，一九三一年开始的日本进攻中国东北的战争，一九三七年开始继续了八年之久的日本进攻中国全境的战争，最后是最近三年来表面上是蒋介石实际上是美国进攻中国人民的战争。这最后一次战争，艾奇逊的信上说，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物质帮助占国民党政府的“货币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美国供给了中国军队（指国民党军队）的军需品”。这就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战争。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以不等价交换的方法剥削中国的农民，使农民破产，给中国造成了数以万万计的广大的贫农群众，贫农占了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

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学生、教员、教授、技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公务人员，都造反了，或者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这样地奇怪，就是这样的一群，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的，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基础。

艾奇逊的白皮书表示，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目前这个局面是毫无办法了。国民党是那样的不行，无论帮它多少总是命定地完蛋了，他们不能控制了，他们无可奈何了。艾奇逊在他的信中说：“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在我国能力所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

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

按照逻辑，艾奇逊的结论应该是，照着中国某些思想糊涂的知识分子的想法或说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强盗收心做好人”，给人民的中国以平等和互利的待遇，再也不要做捣乱工作了。但是不，艾奇逊说，还是要捣乱的，并且确定地要捣乱。效果呢？据说是会有的。依靠一批什么人物呢？就是“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

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内部，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土地革

命，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然后，才有希望把已经缴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阶级分子、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成员及其帮凶们给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并尽可能地把他们变成好人。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目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

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这些人们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要以为胜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还要做工作，还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真正地争取这些人。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

“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

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或者相当大的距离。

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

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因为，据说，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国的”，在中国没有根的，是德国的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国的列宁（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还活着）强加于中国人的，而且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坏透了，提倡什么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等等，因此，必须推翻。这件事，经过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幕后总司令，艾奇逊国务卿（即经手发布白皮书的一位可爱的洋大人）和司徒雷登滚蛋大使们一“鼓励”，据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艾奇逊们认为这是在做“鼓励”工作，但是很可能被中国的那些虽然相信美国但是尚有爱国心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认为是一瓢冷水，使他们感觉丢脸：不和中国的人民主专政的当局好好地打交道，却要干这些混账工作，而且公开地发表出来，丢脸，丢脸！对于有爱国心的人们说来，艾奇逊的话不是一种“鼓励”，而是一种侮辱。

中国是处在大革命中，全中国热气腾腾，有良好的条件去争取和团结一切对人民革命事业尚无深仇大恨，但有错误思想的人。先进的人们应当利用白皮书，向一切这样的人进行说服工作。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别了，司徒雷登^{*}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毛 泽 东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

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杜鲁门、马歇尔系统不想直接侵略中国。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谈失败了，欺骗不行了，战

争揭幕了。

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

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来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国民党腐败无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还是要出钱出枪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论上”是妥当的。单就美国统治者来说，“回顾起来”，也是妥当的。因为这样做起来实在有兴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行的，“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不是我们——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不想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形势，美国的形势，还有整个国际的形势（这点艾奇逊没有说）不许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条路。

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做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欧洲马歇尔计划陷入全盘崩溃的惨境。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

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

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弔”，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毛泽东给阿哈买提江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新疆伊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哈买提江先生：

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包括全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各解放区、国内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在内的新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慎重筹备之后，即将在九月内召开全体会议。此届全体会议除制定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自己的全国委员会外，并须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如蒙同意，请赶于九月上旬到达北平。谨此电达，并希赐复。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 毛泽东

八月十八日 北平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三万人口以上城市 均须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九日)

各中央局，分局：

太原解放至今不到三个月，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议，成绩极好。各地除石家庄、上海、北平已报告开会外，尚未据报开会，这是很不好的。兹规定：

- (一) 三万以上人口城市均须开各界代表会。
- (二) 会期，中小城市至少每月一次，每次一天，至多两天。大城市每月或每两月一次，每次一天两天，至多三天。
- (三) 每次解决问题不要多，应集中在一两个问题上。
- (四) 代表应固定为半年改选一次，连选者得连任。在六个月内，不称职者临时改换，未吸收者逐步增加。
- (五) 代表会毕，有向人民传达和解释会议报告和决定的任务。
- (六) 此指示转达所属三万人口以上的一切城市，勿误。
- (七) 你们应重视此事，总结经验，报告中央为要。

中 央
八月十九日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附：太原市关于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况报告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

太原市各界代表会第五次会，定未号召开。根据后几次会，尚有如下一点经验。即每次会后，应派人到各工厂、学校、街道，检查、帮助代表传达。我们在检查中，发现不少代表创造各种方法进行传达。但也有少数代表，参加会后并不进行传达，也不收集群众意见。相反，在检查时，还假说“已经传达过了”。经过检查、帮助，并让传达工作做得好的代表在会上作典型报告。这样，一些不积极的代表，亦开始积极起来。此一工作，每次会后都应进行。但要与会议内容结合。例如，四次会的中心是市场管理白洋及卫生方面的问题。检查和帮助的对象，应着重在各区街的代表。此外，有的单位的负责同志是军事代表，对各界代表会的意义认识不够，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或在解答代表所提问题和建议时，不够负责严肃。前者已将其中特别突出者，用市委名义发了通报，后者用市府名义（因解答问题，主要是市府各局）发了通知。经过这样做，已开始得到纠正。现正准备第五次各界代表会后，普遍进行改选代表。详情后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须集中 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等问题 给彭德怀等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彭张，并贺习^{〔1〕}：

各电均悉。（一）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和鼓动士气，作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二）同意在定西或兰州开一次西北局常委会，请你们计算时间，贺龙同志如能于九月十五日赶到北平参加政协（政协准备九月十日开幕，二十日闭幕，贺于十五日到，可参加会议的一半），即可偕仲勋一道去兰州附近开会，惟路上须带充分的护卫武装，并须保守机密为要。（三）贺来北平一次，不但参加政协，还有和邓小平商量入川任务及带张治中邓宝珊一道去西北之必

* 这个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

要。(四)西北局须准备移至兰州,将来西北人民政府须建立在兰州。

中 央
未 梗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指张宗逊,贺龙、习仲勋。

关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 团结民主人士问题^{*}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董 必 武

一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问题

去年“五一”，我党中央号召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因为那时看胜利形势的发展，没有像现在这样快，所以当时想象的新政协是小规模的，想由新政治协商会议，草拟政治纲领，商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方法，然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发出之后，得到各民主党派的赞成和拥护，许多民主人士从香港、上海、平津及其他各地，陆续来到解放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来解放区的人更多了。今年六月十五日在北平召开新政协筹备会，有二十三个单位参加，代表一百三十四人，负责新政协的筹备工作。筹备会已通过了出席新政协的各单位及各单位的代表名额。参加新政协的，计有四十五个单位，包括各民主党派，工、农、青、妇、学各人民团体，文化教育界、工商业及自由职业者中的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各种宗教的代表等；此外还有

* 这是董必武对华北人民政府科长以上党员干部的讲话。

特别邀请的代表。计党派代表一四二人，区域代表一〇二人，军队代表六十人，人民团体代表二〇六人，四十五个单位共出代表五百一十人。筹备会并且决定十个代表以上的单位有两个候补代表，十个代表以下的单位有一个候补代表。前者计三十三个单位，后者十二个单位，这样又增加了七十多人列席会议。特别邀请的代表，尚未最后确定，大体估计，当不会超过七十人。如此计算，新政协代表将在六百人以上，七百人以内。

按照新政协筹备会的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代表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拥护新民主主义的，具有某一方面代表性的人物都可包罗在内，代表数目是很庞大的；质量也是相当整齐的。新政协的代表名单，由本单位提出后，还要在筹备会中由大家协商。大体上讲质量是好的。政协代表人数如此之多，质量又相当整齐，而革命发展，人民需要它担负的任务更大，所以“新政协”这一名词已不能包括其全部意义；筹备会的常委会已决定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意思就是说它代表中国人民作政治协商的工作，实际是一个全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同时也是一个全国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它不仅是一种会议，并且有执行机构和日常办事的机构；所以它的组织法草案中规定有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全体会议闭幕时，设立全国委员会；主持经常会务的是全国委员会选出的常务委员会。在地方视需要经过协商也可以成立地方委员会。

人民政协的职权，概括言之，可说是极大而且很特殊。说它的职权极大，因为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有等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表现在它可以制定参加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共同遵守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这一纲领

有宪法的性质；它可以制定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它可以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说它特殊，因为它的全体会议在选出全国委员会后，它和国家政权机构就无直接关系。全国委员会是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不是国家政权的最高组织。它还要保证执行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决议及其自身的决议，这是中国革命条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的形式。

二 团结民主人士问题

中国新的政权机构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爱国民主人士。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及政府中，特别是在县以上的政权机构中，都应该有他们的代表参加，并且有职有权。

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第八段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第九段又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样，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

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对他们的错误或缺点采取迁就态度，是不对的。对他们采取关门态度或敷衍态度，也是不对的。”毛主席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说：“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中国的革命是全民族人民大众的革命，除了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而外，其余的一切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里把中国革命的四个朋友三个敌人说得清清楚楚。我引证以上的文件，就是想说明现在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基本方针。我们党的中央已把这个统一战线的内容，规定为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那末，我们从中央到地方，特别是县以上的地方，所要建立的政府，一定是

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一定要包括民主人士在内。

我们所说的民主人士是指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分子及民主爱国人士，这些人士是很复杂的。用革命的尺度来看，有同情革命运动，直接参加工作的；有同情革命运动参加工作积极和不积极的；有同情革命而自己不去行动的；有同情革命但不明白我们革命是搞些什么的；有在革命高涨时他轰轰烈烈地干，很积极，而当革命低潮时便表现消沉的；有过去是反革命，觉悟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有不久以前还是反革命，新近参加革命阵营的。

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要把帝国主义势力、封建残余势力、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及三者结合而成的反动统治，消灭干净。

怎样把革命进行到底呢？用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力量，肃清一切反革命，这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我们应该而且必须采取各种方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到的人士归向革命，以孤立反革命势力。对于一切民主人士是要有原则地有步骤地去争取他们。所谓原则，目前即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凡赞成这三反的人，都可以做我们的朋友。所谓有步骤，丝毫不是丧失革命立场，而是把我们革命观点中最基本的及最一般的原则提出来，凡同意这种原则的就是我们的朋友。像北平解放的方式是不用战争用和平谈判解决的方式，依照这种方式现在长沙也解放了。这是很好的，人民少受些痛苦，地方少受些破坏，花较小的代价，争取了胜利。开始时固然有些麻烦，不痛快。但干革命事业有时干得很痛快，也有时干得不很痛快。革命不一定是为了干得痛快，只要能达到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目的便好。去年“五一”，我党中央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发出以后，赞成这个号召的各党派，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对我党的领导，

对和平的幻想，对英美的依赖，对苏联的怀疑等等问题很多。随着军事的胜利，我党中央政策的正确，各党派都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四月国民党反动派拒绝签字于他们代表所同意的和平条件，我军迅速渡江，在沪、港抱和平幻想的人也都觉悟了。毛主席“七一”文告发表后，他们对英美和对苏联的认识都和以前不同了。美帝国主义“白皮书”发表之后，各党派、各民主人士都表明态度，说自己与美帝国主义所指的“民主个人主义”无关。现在我党的政治主张，没有一个民主党派公开提出反对的意见。从旧的、因袭的、资产阶级的观点，到接受新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观点，即使是个别的观点，也等于脱胎换骨。脱胎换骨不是一下子可以完成的。因此争取团结是要有步骤的。对于有一点民主倾向的人，要耐心说服他们接受我们的政治主张，给他们以工作岗位，甚至有些为人民事业立过功的人位置还会比我们高些；在物质生活方面他们也特别受优待。如以前发表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文件，有我党和其他党派列名；而我党只有毛主席一人署名为首，其后列各民主党派领袖的名字。难道说我党中央书记处各书记同志的声望地位比不上其他党派领袖吗？毫无疑问是比得上的。但他们没有列名。又如这次政协会议代表，我党许多领导同志没有提名参加，因政协规定代表一定要出席，而许多领导同志不能离开工作岗位，不能出席也就不能提名；还有更多的同志可以当代表，因为代表名额的限制和工作关系没有提名作代表；有些同志出在某一单位可以当代表，而出在另一单位，却只能当候补代表；在党内，还有些同志的革命资历不深，因所属单位（如人民团体）不同，需要他当代表，而资历较深不属于那种单位的却不能当代表。这些事例，如果不从整个革命形势来看，单从个人资格地位出发去看，那是想不通的。又如许多民主人士被招待

在北京饭店、六国饭店，有些民主党派的领袖们特别受优待，住较漂亮的房子，吃特灶，我们许多同志干了多年革命工作，住的吃的都很蹩脚。这事例一样只有从革命发展的需要和人民全盘利益来考虑，才能想得通。

我们的同志有的不明白这个道理，讲许多怪话，说：“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早革命不如迟革命。”“革命困难的时候看不见他们，革命胜利的时候他们都来了。”“从前没有他们，革命还不是一样胜利？”总之，是满肚子不舒服。这些话初听好像有点道理，实际是极错误的。说这样的话的人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干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是无条件的。不讲条件而担负革命的任务，革命才是光荣，不革命自然没有那种光荣，反革命更是光荣的反面，不是光荣而是耻辱、罪恶。早革命则早享受光荣的称号，迟革命则享受光荣的称号也就因之而迟。革命胜利之前有困难，革命胜利之后不能说绝对没有困难。没有民主人士陆续参加革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不会巩固的。把革命的光荣降低到与不革命，甚至与反革命相比，这样错误的思想是很危险的。单纯计较地位和享受，这是把革命的观点庸俗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是要改变社会制度，个人生活的提高，一般说要在社会生产力提高以后才能达到。如果单从个人出发去想问题，我们的脑筋想个人问题的时间费得多，想社会问题的时间就费得少了，这会障碍自己革命思想的发展，妨碍革命工作的推进。这一思想问题不解决，将来与民主人士相处是很困难的。

人民解放军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战争，很快便要在全国取得胜利，这个胜利是很伟大的。但是这个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开始，还不是彻底的胜利，还需要巩固这个胜利。我军所到达的大城市，明显的官僚资本都被没收了。官僚

资本主义基本上消灭了。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封建势力至少也得要三年至五年，才能解决。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特权，在我们势力范围内，我们已做到了。三反的任务，仅仅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还不能宣告结束，所以凡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都要联合起来继续干，我们联系得愈广愈紧密，我们的敌人愈少空子可钻，我们就能愈快愈便利地完成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不团结民主人士，不争取可能争取的朋友，我们便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我们便陷于孤立，便不能取得革命彻底的胜利。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曾犯过这些错误，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建立起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应该领受过去的教训。对于民主人士必须给以适当的物质上的优待。不然，要他们和我们一样吃苦，他们做不到，就不来直接参加革命，就减弱了革命阵营的势力。这是政治影响、政治力量的问题，不能够用一、二、三、四的数目字来计算的。

就经济建设方面说，中国的近代工业仅占国民经济百分之十，这样的经济基础是很薄弱的。私人资本主义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还要小，但它有百分之九十的小生产陪伴着，在小生产的基础上不间断地产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本身虽不强大，在国民经济中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因素。因此，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人士，在现时国家政权中，不能没有他们的位置。做社会革命工作，决不能拿一个生活标准的简单模型去衡量，合乎我们模型的才要，不合的便不要，尺度应该放宽些。也不能说我们和民主人士分开工作，各搞一套。只有争取民主人士到我们阵营里来，才是符合于革命的利益，符合于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是正确、坚定的方针。不争取民主人士和我们合作，即不争取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合作，就违背了党的方针。

今天中国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它经过共产党来实现它的领导。现在我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都拥护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是偶然的。领导而能得到被领导者的拥护，要具备下列三个条件：第一要有正确的政治主张；第二要照顾被领导者的物质利益，才能使他们感觉有骨有肉，和自己生活有关系；第三还要有我党同志的忘我精神，坚决行动，以身作则，争取胜利。这三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三 对于反革命分子投入革命阵营的态度

过去反革命的人，只要他愿意到人民革命阵营里来，我们是欢迎的。今天反革命的人，只要他明天愿意到人民革命阵营里来，我们也是欢迎的。我们争取这些人便能减少革命的阻力，避免更大的牺牲，把反革命集团孤立到最小的一点，因而更便于肃清它。

从阶级感情出发，对反革命分子屠杀革命分子的仇恨，是完全对的。但是当他们放弃了反革命立场的时候（这当然要有具体事实的表现，而且这种表现是我们花很大力量才能得到的），我们除批判他过去的错误以外，就要进而团结他们，才是符合于革命利益和人民最大利益的。这一点，一定要有明确的认识，不然好些问题便想不通。有些过去屠杀很多人的反革命者，今天他悔悟了，他愿意参加到革命阵营里来，已经为人民立了功，我们怎能拒绝他们呢？又如傅作义先生、程潜先生等，都和我们打过大仗，这当然不好。但北平和长沙是用和平方式解决的，他们立了功，人民愿意他们这样干，他们这样干了；这些人可能在今后的政府中获得较高的位置。如果我们不加区别地追究过去，不允许他们改过自新，不让他们获得适当

的工作岗位，我们便没有道理，人民将不原谅我们，我们的圈子便会缩到很小。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因为他们今天参加革命的光荣，就涂掉他们过去反革命的事实，过去的事实，让历史去评判，用不着我们去追究了；对待他们应当和对待一直坚决反革命的分子有基本的区别。对待他们要宽大，对待坚决反革命的分子就要严厉。

四 对民主人士的态度

团结民主人士，是人民革命的需要。但我们与民主人士之间，是一定有若干距离的；这些距离表现在政治主张上、生活习惯上、工作作风上及思想意识上。因此，对待民主人士的态度，不只是一定要团结，而且要有批评有斗争，才团结得更好。

分析一下我们与民主人士之间，哪些距离是可以接近，哪些距离是不容易接近的呢？

政治上的距离，是较易接近的。因为我们的政治主张，是符合于被压迫的广大人民的要求的，他们也生活在广大人民中间，他们也时有被压迫的感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所扶持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对他们是压迫的，只要他们愿意理解我们的政治主张，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容易被他们接受的。我们首先要争取这一点；这一点不能接近，便不能合作。工作作风的接近，就要慢些。生活习惯方面某种程度的接近并非全不可能，同样要慢慢来。思想意识方面的接近，有些要更慢，有些简直不可能。本来政治主张也属于思想意识的范畴，我在这里所指的思想意识是更广泛，包括宇宙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等等在内，这因为他们的经济生活和我们不同，产生他们和我们不同的思想意识。在某一个问题或某一点上我们可以求得和

他们相同，在另一问题或另一点上他们和我们有分歧。有些问题甚至他们毕生也不能和我们一致的，这倒不必勉强要求一致。认识了这些距离，我们在团结他们时，对他们要进行适当的批评与斗争。

只有批评与斗争才能推进团结，才能使团结巩固起来。斗争与团结结合起来这一原则要我党同志适当灵活地运用，无论如何，不能把党内斗争方式拿来呆板地应用。我们和民主人士阶级立场根本上是不同的，但这不妨碍我们和他们在一定时期政治上的一致；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

在政权机构中，既要与许多民主人士合作，就应该有适当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如在上面领导，我们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就要向他请示。在工作上，一切应该通过他才能做的事情要通过他；他不同意的时候，用充分的理由向他陈述；他还不听，我们要报告党的领导机关，党会对他进行解释的。在政协筹备会以前，我们和民主人士谈了许多问题，如对中间路线及土改问题等；经过详细的三番五次的解释以后，他们大体上赞同我们的意见了。其中可能还有个别人士对个别问题不很了然和释然，抱沉默的态度；一般的总算解决了。我们要善于说服他们，用他们能够懂的道理，甚至于用他们能够懂的语言，不要把马列主义的词汇，生硬地搬到他们面前，使他们感觉一时难以消化。这样做工作是相当麻烦的，但是革命就要不怕麻烦。我们对于同级的人，要尽量和他商量，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反对的意见，要考虑这些不同的意见和反对的意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为尺度，去考虑他们的意见。我们对于下级，要鼓励他们提意见，和我们不同的意见甚至反对的意见也可以提出来。不要抹杀他们的意见；对的我们

接受，不对的也要给以解释。

对于民主人士，我们要多帮助他们，决不要瞧不起他们，自以为是是不好的，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也不要迁就他们，随声附和也是不好的。一定要有团结、有批评与斗争。慢慢改造他们，不要着急。要诚恳坦白，谨慎谦虚。出发点是团结，最终的目的也是团结。是否有团结不了的人？个别这样的人是有的，我们用了一切团结的方法，还团结不了他，那他也就慢慢地孤立起来了。他孤立了还不觉悟，那就只好由他去了。

五 党内团结

华北人民政府是民主联合政府。从过去的经验，我想可以得出这样一条：党员首先要团结，才能做到和民主人士的团结。过去我们政府工作中党员间是有不团结的现象的，特别是负一部门领导责任的党员间有些不团结的现象。这种不团结并不是因为有原则主张不同，而是因为工作作风的不一致。我们能不能使我们的工作作风趋于一致呢？某种程度的一致，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工作作风不是不可改变的，不好的作风只要大家指出来，谁也不会去维护它；好的作风谁也不能说不好，我们共产党员是服从真理的。问题要摆在桌面上来谈，开会来谈，不要背后随便讲，而开会时不讲，或是阳奉阴违，都是不好的。领导同志尤其要注意这一问题。这里顺便讲一下态度问题，同志中间相互批评，不应把态度问题当成为原则问题，因为甲说乙的态度不好，乙也可说甲的态度不好，互相间在党内研讨一下，彼此改正就是了。但态度问题有时是原则问题，例如领导工作者态度不好，以致不能很好地推动工作，或在群众工作上，影响了与群众的联系，这

样态度问题便成为原则问题了。

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保证了党内的团结，只有党内团结，才能更好地团结民主人士。各部门同志要很好地检查党内团结问题。

根据法律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董必武统一战线文集》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各县均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给华东局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华东局，并告各局，各野前委：

未敬电悉。

(一) 你们过去对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项重大问题，没有发出指示，自己亦未在上海执行，故对此事处于被动地位，并因此使城市工作受了相当大的损失。现在你们已在上海开了一次各界代表会议，收到了良好效果，并已于八月二十四日给所属发了指示，你们因此就在此项问题上恢复了主动权。中央看了，极为高兴。除将你们电报转知各局、各野外，现在请你们严催所属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务于九月份一律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一律将开会情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广播台上公开广播。不许可有不开的，不许可不公开发表和不做口语广播。借此以使所属三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党的组织和各界人民代表亲密结合，经过他们去团结各界人民，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克服党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人只相信少数人的党内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官僚主义作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风。以后一切三万人以上的城市至少每月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次，每次一天至多二天就够，每次讨论和决定的问题有一个或二个就够。

（二）各县要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办法照中央最近致华中局并告各局的电报^{〔1〕}办理。要各省委、区党委、地委负责领导办理，一改过去长期不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不良作风。此项全县各界人民会议，不论新区老区一律举行。新区在占领两三星期后即可举行，无须待乡村农会建立然后举行。举行此项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是经过此种会议去发动农民群众。

（三）上述两项请东北局、华北局、山东分局、西北局、华中局、华南分局一律遵照办理。各野前委注意研究和协助。

中 央
八月二十六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指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各县均应召开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指示要求新老解放区各县每月或每两月至少召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农会、工会、学生会、文化教育界、工商业界及党政军选派代表参加，讨论全县工作。大县代表二百余人，中县代表一百余人，小县代表数十人，每次二至三天开完。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毛 泽 东

关于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我们业已在三篇文章（《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中给了批评。这些批评，业已引起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民主人士的广泛的注意和讨论，他们并发表了许多正确的和有益的声明、谈话或评论。各种讨论白皮书的座谈会正在开，整个的讨论还在发展。讨论的范围涉及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一百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取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应取的态度，对于帝国主义的新阴谋如何对付，等等。这种现象是很好的，是很有教育作用的。

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需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讨论美国的白皮书。过去关于这种讨论之所以没有获得机会，是因为革命还没有得到基本上的胜利，中外反动派将大城市和人民解放区隔绝了，再则革命的发展还没有使几个矛盾侧面充分暴露的缘故。现在不同了，大半个中国已被解放，各个内外矛盾的侧面都已充分地暴露出来，恰好美国发表了白皮书，这个讨论的机会就找到了。

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就这一点来说，表现了帝国主义已经脱出了常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革命，已经迫使美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一个方面，一个派别，要用公开发表自己反对中国人民的若干真实材料，并作出反动的结论，去答复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派别的攻击，否则他们就混不下去了。公开暴露代替了遮藏掩盖，这就是帝国主义脱出常轨的表现。在几星期以前，在白皮书发表以前，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老奸巨猾的英帝国主义及其他几个小帝国主义国家，至今还是如此。后起的，暴发的，神经衰弱的，一方面遭受人民反对，另一方面遭受其同伙中一派反对的美国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认为以公开暴露若干（不是一切）反革命真相的方法来和他们同伙中的对手辩论究竟哪一种反革命方法较为聪明的问题，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他们企图借此说服其对手，以便继续他们自认为较为聪明的反革命方法。两派反革命竞赛，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争得不得开交了，一派突然摊牌，将自己用过的许多法宝搬出来，名曰白皮书。

这样一来，白皮书就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教育材料。多少年

来，在许多问题上，主要地是在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和社会主义的本性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所说的，在若干（曾经有一个时期是很多）中国人看来，总是将信将疑的，“怕未必吧”。这种情况，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以后起了一个变化。艾奇逊上课了，艾奇逊以美国国务卿的资格说话了，他所说的和我们共产党人或其他先进人们所说的，就某些材料和某些结论来说，如出一辙。这一下，可不能不信了，使成群的人打开了眼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艾奇逊在其致杜鲁门的信的开头，提起他编纂白皮书的故事。他说他这本白皮书编得与众不同，很客观，很坦白。“这是关于一个伟大的国家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这个国家早就和美国有着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凡是找到了的材料都没有删略，尽管那里面有些话是批评我们政策的，尽管有些材料将来会成为批评的根据。我们政府对于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能够感应，这便是我们的制度的固有力量。这种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正是右派和共产党的极权政府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

中美两国人民间的某些联系是存在的。经过两国人民的努力，这种联系，将来可能发展到“极亲密的友谊的”那种程度。但是，因为中美两国反动派的阻隔，这种联系，过去和现在都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并且因为两国反动派向两国人民撒了许多谎，拆了许多烂污，就是说做了许多的坏宣传和坏事，使得两国人民的联系极不密切。艾奇逊所说的“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不是说的两国人民，而是说的两国反动派。在这里，艾奇逊既不客观，也不坦白，他混淆了两国人民和两国反动派的相互关系。对于两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美两国反动派的失败，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这个时期，是一

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时期。只有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和其他美国反动派，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他中国反动派与此相反，确是“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

艾奇逊们对于舆论的看法，混淆了反动派的舆论和人民的舆论。对于人民的舆论，艾奇逊们什么也不能“感应”，他们都是瞎子和聋子。几年来，美国、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反对美国政府的反动的对外政策，他们是充耳不闻的。什么是艾奇逊所说的“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呢？就是被美国共和、民主两个反动政党所操纵的许许多多的报纸、通讯社、刊物、广播电台等项专门说谎和专门威胁人民的宣传机关。对于这些东西，艾奇逊说对了，共产党（不，还有人民）确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于是乎帝国主义的新闻处被我们封闭了，帝国主义的通讯社对中国报纸的发稿被我们禁止了，不允许它们自由自在地再在中国境内毒害中国人民的灵魂。

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但是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错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

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

至于艾奇逊所说的“右派极权政府”，自从德意日三个法西斯政府倒了以后，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政府就是第一个这样的政府。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府，包括受帝国主义庇护的德意日三国的反动派政府在内，都是这样的政府。南斯拉夫的铁托政府现在也成了这一伙的帮手^[1]。美国英国这一类型的政府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向人民实行专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对于资产阶级内部是有所谓民主的，对于人民则是独裁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佛朗哥、蒋介石等人的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资产阶级内部民主的幕布，是因为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了极点，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较地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美国政府现在还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国反动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颜色，比起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的朝代来是差远了，这是阶级斗争迫紧了几步的缘故。再迫紧几步，美国的民主布必然要被抛到九霄云外去。

大家可以看出，艾奇逊一开口就错了这许多。这是可以避免的，因为他是反动派。至于说，他的白皮书是怎样一个“坦白记录”这一点，我们认为坦白是有的，也是没有的。艾奇逊们主观上认为有利于他们一党一派的东西，他们是有坦白的。反之，则是没有的。装作坦白，是为了作战的目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注 释

〔1〕一九四八年六月，由保、罗、匈、波、苏、法、捷、意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参加的情报局会议，作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对南共进行公开的指责，并把南共开除出情报局。当时，中国共产党支持了这个决议。一九四九年情报局又通过《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的决议。对这个决议中国共产党没有表示态度。关于对待南斯拉夫的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毛泽东在同南共联盟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团谈话时曾说：我们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过去听了情报局的意见，我们虽然没有参加情报局，但对它也很难不支持。一九四九年情报局骂你们是刽子手、希特勒分子，对那个决议我们没有表示什么。一九四八年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应该和你们商量。假如你们有些观点是错了，可以向你们谈，由你们自己来批评，不必那样急。反过来，你们对我们有意见，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采取商量、说服的办法。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这次事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取得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友谊”，还是侵略？^{*}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

毛 泽 东

为了寻找侵略的根据，艾奇逊重复地说了一大堆“友谊”，加上一大堆“原则”。

艾奇逊说：“从我们历史很早的时期起，美国人民和政府就关心中国了。虽然距离遥远，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两国隔离开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许多年来种种善意措施便是证据，例如用庚子赔款来教育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废除治外法权，以及战时和战后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等等。美国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这是有案可稽的。”

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〇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

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据白皮书说是四十五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所有一百零九年（从一八四〇年英美合作的鸦片战争算起）美帝国主义给予中国的“友谊”，特别是最近数年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这一项伟大的“友谊”，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

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不为别的，第一为了门户开放，第二为了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第三为了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然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行政和领土，还算叨了艾奇逊第二个神圣原则的光，“依然维持”住了它们的“完整”。其余地方，一概倒运，行政和领土都是破碎得不像样子了。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地方，叨了第三个神圣原则的光，把“任何外国的控制”，连同美国的控制也在内，都给艾奇逊们“反对”掉了，因此还被中国人控制着。其余的国土，说来要掉眼泪，一概完了，都给外国人控制住了，中国人统统当了奴隶。至于是什么外国呢，艾奇逊老爷行文至此，还没有来得及点出，下文自明，无须多问。

不干涉中国内政，是否也算一条原则呢，艾奇逊没有说，大概不能算吧。美国老爷的逻辑，就是这样。看完艾奇逊信件的全文，就可以证实这一项高明的逻辑。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军委关于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 较利我军作战给林彪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

林邓萧赵^[1]：

三十日电^[2]悉。(一)你们歼灭宋希濂的计划是很好的。(二)程子华兵团主力在澧州、常德以西地区歼灭宋希濂以后，请考虑该部取道沅陵向芷江前进，歼灭该地区之黄杰部，然后沿湘黔桂三省交界向柳州前进，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而不使他退入贵州，以利我军在广西境内歼灭他。因贵州太穷，运输不便，广西较贵州为富，又可取得广东接济，又有我们的游击区及游击队以为协助，较利于我军作战。(三)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等九月上旬可在赣州会合，中旬可会商完毕，下旬即可开始向广东进军。若萧劲光、程子华各部亦能于九月下旬或十月上旬进至芷江、宝庆、衡州之线，则可与入粤部队互相配合。我们希望能于十一月占领广州及粤汉全路，十二月或明年一月全路通车，则对全国财政经济有很大利益。

军 委

申东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五卷刊印。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注 释

〔1〕指邓子恢、萧克、赵尔陆。

〔2〕指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白崇禧已改变在湘西寻我作战的计划。宋希濂已令所部出发，向石门、澧县、常德进攻，但该敌仍有中途改变计划的可能，而无论该敌是否前进，我军均拟攻歼该敌。

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律师制度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日)

上海市委并告华东局，各中央局及分局：

市委关于处理旧律师问题电收到。我们对律师问题有下列意见：

(一) 旧律师不能继续执行业务的原因是：

(甲) 他们所学所用的反动的六法全书已经明令废除；

(乙) 随着整个国民党国家制度及司法制度的腐化堕落，中国旧律师制度已形成为欧美资本主义的敲诈习气加上中国封建时代的讼棍作风之混合体，因而旧律师中贪污腐化者多，廉洁奉公者少；

(丙) 人民法院实行为人民服务的诉讼程序及审判方法，使绝大多数当事人感觉到无出资雇用私律师的必要。

(二) 资本主义国家及国民党统治时代均采用私律师为主公设辩护人为辅的制度，私律师主要地是为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及其他有产阶级服务的工具；他们的所谓公设辩护人名义上是为请不起私律师的穷苦当事人或找不到私律师的政治犯、刑事犯而设，实际上他们不仅是骗人的幌子，而且很多时候是害人的媒介。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我们拟采取公律师为主私律师为辅的律师制度；即在司法行政机关的领导和组织下，在各级人民法院——首先是大中城市的人民法院及高级的人民法院中

设置适当数量的公律师，为广大人民的诉讼与非讼事件服务；同时，允许某些经过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合格发给营业执照的律师去执行私律师的业务，以供某些愿意和能够出资的人雇用。但这些律师的业务活动及收费数目等均须遵守司法行政机关之规定。

（三）除作恶多端、贪污腐化、声名狼藉或反革命分子须加以处分或着令改业外，所有旧律师愿在人民民主国家继续执行律师业务者，须一律重新进人民政府所办之政法学校或司法训练班或新法学研究机关受训，以便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的社会观、国家观与法律观，学习人民民主专政为人民服务的政策法令及司法制度与司法作风；同时，对国民党的和一切欧美日本的反动的旧的社会观、国家观与法律观，进行彻底的批判；对旧的反人民的司法制度与司法作风，进行系统的清算。受训期满经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合格者，发给允许执行律师业务的执照。任何不愿受训以改造自己思想与作风的旧律师，均不得执行公律师或私律师的业务。

（四）为培养新法学干部及改造旧司法人员，中央已在北平设立政法大学及新法学研究院；惟因物质条件限制，每期不能招收很多人员。请考虑可否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改造旧司法人员及培养新法学干部的司法训练班或政法学校等？你们对此问题有何意见？请即电告。

中 央

申冬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 中国的领土——西藏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日新华社社论)

七月八日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英、美、印反动派勾结西藏地方反动当局举行这个“反共”事变的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地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这一个阴谋事变和最近美帝国主义妄图吞并台湾的阴谋是同出一辙。一百多年来英美帝国主义就一贯地图谋侵略和吞并西藏。英帝国主义在一八六〇年首先侵占了西藏的外藩哲孟雄（即锡金）。一八八七年和一九〇四年又两度发动过侵略西藏的战争。美帝国主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亦积极图谋侵略西藏。美帝国主义曾派遣间谍到西藏活动，力图经过西藏的若干上层分子，取得对西藏的实际统治权。中国人民对于美、英、印侵略者的侵略活动早已予以密切注意，而且深深地记取了他们这种与中华民族为敌的罪行。

英、印反动派为了吞并西藏，竟敢妄想否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侵略者在白昼说梦话。任何人找遍中外公开出版的地图和关于中国内政外交的文件也无法找出任何的“根

据”。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西藏民族加入中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与汉族及中国境内其他民族发生兄弟的关系，已有悠久的历史。西藏民族与汉族及中国境内其他各民族的友谊，曾经受过英、印侵略者和汉藏两族反动分子的损害。但是西藏的爱国人民正在逐步地认识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扶助少数民族的政策，乃是西藏人民的救星。中国的任何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的分裂，必将沦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奴隶，西藏人民是决不愿做殖民地奴隶的，他们在一八八七年和一九〇四年两次英勇抗击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次英、印侵略者唆使西藏地方当局，以“反共”作为借口，发动变乱，企图混水摸鱼，更是极端冒险的蠢事。不错，国民党反动派是应该从中国土地上驱逐和消灭的，但这是中国人民自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与任何外国无干，与任何反共分子无干。中国人民已经在很大部分的土地上消灭了国民党反动势力，而且不久的将来，就会在全部国土内把他们扫荡得干干净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劳动人民的政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全中国人民都公认和信赖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领导地位。在今天，谁要反对中国共产党，谁要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谁就要冒和国民党一样被扫灭的危险。中国共产党是主张少数民族的自治，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习惯的，凡是知道内蒙解放区和甘肃已解放的回民区情形的人，已经不再有怀疑了。外国侵略者在西藏散布反共的谣言，借以欺骗恐吓西藏当局，其目的是想使他们陷于极端危险的地步，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四百余万的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中国各民族，即不但解放汉族人民，而且解放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

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大多数汉族人民和内蒙古人民，正在解放着回族人民，并即将解放藏族和西北、西南、华南其他各族人民，使他们永远摆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和穷困悲惨的地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任何侵略者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如果敢于在中国领土上挑衅，如果敢于妄想分割和侵略西藏和台湾，他就一定要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之前碰得头破血流。我们警告这些侵略分子立即在西藏和台湾的面前止步，否则他们就必须担负他们这种行为所引起的一切后果的全部责任。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三日《人民日报》
刊印。

毛泽东关于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 给饶漱石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日）

饶漱石同志：

陈云同志已回，九月二日在中央会议上作了报告。中央同意此次上海会议决定的总方针及许多具体办法。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不轻议迁移，不轻议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多余人员设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去。自愿和可能迁移的工厂、学校，必须精密筹划到新地后能够维持下去，并有前途，否则不要迁移。对难民的迁移，亦须如此。着重节约那些本来可以减少的开支，但不要减少那些必不可少的开支。着重反对浪费，从这里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钱。封锁在目前时期对于我们极为有利，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看，都是有利的。已裁的二万七千人，是一件大事，已引起很多人不满，应加以处理。其办法是立即加以调查，分别自己有办法生活和自己无办法生活的两类，对于后一类人，应予收回，给以饭吃。现在无事做，也应给以饭吃，维持他们，使他们活下去，否则政治上对我们极为不利。就全局来说，全国养九百万至一千万人是完全有办法的。各级领导人多和党外各界人士接触，如像陈云此次找各界代表人物谈话、你找三个旧职员谈话那样，探听各界气候，将具体问题向他们

请教及交换意见，而不是泛泛的交际性的接触。积极利用城市的各界代表会议及各县的全县代表会议，将一切施政中的重大问题逐一提出，自己有了准备的想过了的有了办法的问题向会议作报告，并交付讨论，征求他们的意见。此种会议，党员及完全可靠的左翼分子总共超过二分之一，能保证通过我们的意见即够，以便团结大批的中间分子及一部分必须拉拢的右翼分子，使他们向我们靠拢。此种会议，城市最好每月开会一次或三月开会两次，各县似以两月开会一次为宜。新区各县的各界代表会议我们尚无经验，请你考虑选择上海附近一二个县亲自领导，开一二次会试试。以上各点，请以你的意见告我为盼。

毛 泽 东

申江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各地召开 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九月四日)

各中央局，各分局，各野前委：

(一) 华北局转来察哈尔省委末世电报告该省各界代表会的经验，很值得注意，请加研究。

(二) 经验证明，凡未注意召开各界代表会仍然束缚于党内狭小圈子的，就走了弯路。

(三) 必须反对形式主义，每次会议要有充分准备，要有中心内容，要切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当作一件大事去办，否则将损害党的政治威信。

(四) 在新解放区，各界代表会的开始若干次，代表的产生可以推派和聘请为主，由可靠民众团体的民主选举为辅，以后，即可改为由各团体、各界的民主选举为主，推派和聘请为辅。总以既能保证会议由我党领导，又能养成民主精神为原则。

(五) 二万以上不足三万人的城镇，亦可开各界代表会。

(六) 尚未彻底完成土改的省、县、区三级，均开各级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代表会议，乡村开农民代表会议，而以县的各界代表会为中心。

（七）已完成土改的省、县、区、乡四级，均开人民代表大会，但在开始若干次，亦可开各界代表会议，以为过渡。

（八）无论是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党员均不要太多，以能保证通过决议为原则。大体上，党员及可靠左翼分子，略为超过二分之一即够，以便吸收大批中间分子及少数不反动的右翼分子，争取他们向我们靠拢。

（九）会议之前由党委（市委、县委等）召集代表中的党员开会一次，决定方针。能开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则更好，但不要每次都如此。

（十）此电请转发各市、各县，各军、师。

中 央

九月四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

(一九四九年九月七日)

周 恩 来

现在我把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委会关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人选的协商情况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主要内容，向到会的代表做一个报告。

为什么要做报告呢？因为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开会前，使大家对上面说的几方面的情况有一个全貌的了解，以便能引起大家对这些问题的注意和研究。到开会的时候才把只有少数人了解的东西或者是临时提出的意见拿出来让大家来讨论决定，这是旧民主主义议会中议事的办法。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

第一，关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和人选问题。

首先，应该说明政协这个名称有一个改变。原来叫做新政治协商会议，在第一次筹备会全体会议中也这样叫过。后来经

^{*} 这是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向政协代表作的报告。

过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的讨论，觉得新政协和旧政协这两个名称的分别不够明确，便改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同意这个修改意见，将来还要经过筹备会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决定。

从新政协发起到现在，形势有了很大变化。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五一”口号，向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提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磋商国是，并决定如何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时很快得到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在上海、北平和海外的各人民团体、华侨人士的响应，使我们很高兴，于是便邀请各单位参加并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那时我们所设想的这个会议，不过是个百八十人的会议而已，没有想到像今天有这么广大的解放地区和在交通这样便利的情况下来开这样大规模的会。这是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的缘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已经崩溃了。在全国革命战争中，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全国的形势和世界的形势都已经改观了。

这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所以我们对它不得不更加谨慎。为了扩大政协的代表性，首先要扩大参加政协的成分、单位和名额，使它能够代表全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这种谨慎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是以目前政治形势和政治任务的要求为主要根据的。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规定得很清楚，参加会议成员的条件应该是“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及同意动员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是大家一致通过的意见。我们邀请代表就根据这个政治标准。

我们既然是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代表中当然不能包括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即反对新民主主义而拥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代表全国人民，而为全国人民所信任。这就是确定代表时的严肃性。毛主席说得很清楚，我们的政权是属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盟的。此外，政协代表中还包括从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中分化出来并投向革命阵营的爱国民主人士。这就是确定代表人选时的广泛性和灵活性。

我们在确定代表名额和人选的时候，不是平均主义的，而是有重点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四十六个单位的名额和人选的确定，始终都体现着这一重点。参加这次会议的不仅有各民主党派，有多年来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还有各解放区的代表。各解放区在解放战争中担负了重大的任务。我们还承认解放军的代表权，因为人民解放军不单是军事组织，又是政治组织，不仅是普通军队，而且是工作队。他们消灭敌人，从事政治工作，做人民的勤务员。因此，他们所代表的不仅是军队，而且代表着他们出身的人民，首先是农民。这是来自人民属于人民的队伍。解放军代表的参加也体现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重点。除此以外，还有待解放区的代表，包括华南解放军的代表。

有了重点，同时又照顾到了各个方面。在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中，除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外，还有妇女代表、青年代表、学生代表、文艺工作者代表、新闻界代表、工商界代表、教育工作者代表、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我们也照顾到还不能立刻组织团体的方面，如自由职业者代表。我们还照顾到海外华侨和少数民族。这就是参加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的四十五个单位产生的大体情况。但是尽管如此还是不够全面，所以又设了一个特邀单位。其中有在中国整个民主革命阶段中，始终站在正义事业方面的，如孙夫人^{〔1〕}和她领导的救济单位。也有从事科学研究和工业建设的人才，如中央研究院陶孟和先生和资源委员会钱昌照先生。也有一向或在某一个时期和我们有某种联系和朋友来往，同情人民事业，一旦解放了便站在人民这方面的，如福建萨镇冰先生，张难先先生。也有从事民主运动在解放区服务很久的朋友，如陈瑾昆先生。也有是参加这次和平运动有功的，如上海人民代表团颜惠庆先生，南京和平代表团张治中、邵力子等先生。程潜先生也是响应和平号召投到人民方面来的。起义的将军有的作为解放军代表参加会议，如吴奇伟将军，曾泽生将军，张轸将军，也有的参加到特邀单位中。海军、空军的代表也在特邀单位中。还有愿意为建设新的人民的艺术而服务的人物，我们也邀请了，如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几位先生。邀请的代表还有劳动界护厂有功的工人、劳动英雄和在各解放区单位安排不下的，如晋察冀的戎冠秀先生。

总之，决定全部代表人选是根据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原则。我们重视由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土地改革和敌后根据地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主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朋友，脱离反动派而起义的朋友，保护国家器材有功的朋友，使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成为集中代表全国人民力量的大会。

在协商当中，除了政治根据外，我们还要从组织方面说几个问题。（一）党派的标准。凡是在去年“五一”前就建立了组织或已开始建立组织，并且很快地响应了“五一”号召的，就可以作为参加单位。现在参加筹备会的十四个党派单位都是

按照这个标准决定的。其中有三个单位，一是九三学社，一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一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需要做些说明。九三学社是在抗战后期成立的，在民主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响应了“五一”号召。因为当时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不能公开发表意见，所以一直到北平解放时才公开活动。台盟是一个革命的组织，“五一”前就从事台湾人民的解放运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早就筹备，今年才成立，它的前身是青年救国会、民主青年同盟等革命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革命贡献很大。除了这十四个党派外，我们认为有些组织要分别研究对待。如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曾在伪立法院进行过斗争，我们就一方面劝说他们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另一方面把个别人列入特邀单位。又如民社党革新派，我们劝他们加入民盟。当然这样做还要看这两个组织自己的意见。和这类似的其他个别人，也被邀请参加，如汪世铭先生。（二）个人参加的，我们注意到他在社会上的影响和代表性。（三）各单位有自己的标准。我们要求各代表看名单时，不要连起来比较看，应该看其代表的单位在民主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如何。青年学生的代表，虽然不能与其他代表来比，但他们在中国学生当中却有代表性。还有一些情况，有些人在这一个单位可能是正式代表，但在另一单位却是候补代表。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的差别只是个表决权的问题，但是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四）代表名单的产生是经过各方面反复协商的。这样能使各方面的意见得到尊重。（五）参加的代表，一般的都请他们到会，不要只是列名，否则就不能集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原则上能够来的才确定他为代表，不能来的就不提名。不过也有个别特殊情形经过筹备会常委会的同意可以列名而不来的，如年纪过高的萨镇冰

先生。现在的名单一共是六百五十五人，特别邀请的名单中或者还可能增加若干人，将来代表的总数，可能超过六百六十人，当然也可能就是六百六十人。

即将开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确表示了全国人民力量的大团结，从代表性这一点来说，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代表性。但是仍有许多有代表性的人，像彭德怀同志等，因为他们不能来，所以没有邀请。至于个别的遗漏，也在所难免。不过我们觉得筹备会常委会对于这一工作，一般地说已经尽了责任。

第二，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这个草案已经在几天前送达各位代表。现在讲几个主要问题。首先，政协是沿用了旧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但以它的组织和性质来说，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的会，决不是发源于旧的政协。

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有了共产党，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有了大革命运动，经过了四个革命阶段即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八年抗战和最近三年来的人民解放战争，才形成今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样的组织。可以说这是一百多年来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牺牲奋斗的果实，也可以说是三十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获得胜利的集中表现。假如没有一百多年来革命运动的历史积累，尤其是三十多年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便不可能有今天这样济济一堂的政治协商会议。所以，这个会议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运动的一次总结。

一九二四年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那时中国共产党便提出了统一战线的主张同孙中山先生合作了。不幸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走上反动的道路，造成了二十二年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深入农村，发动了土地革命。后来中

国共产党主张团结抗日，多次号召组织统一战线。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坚持一党专政，所以在革命的后三个阶段内，统一战线没有能够发展成今天这样宏大的规模。但这一政策始终贯彻于四个阶段，直到现在革命战争快接近全面胜利的时候，才有可能召开这个会。肯定地说，这一组织便是中国共产党过去所主张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形式。它绝对不同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已经让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可是大家都熟悉这一组织形式，所以今天我们沿用了这个名称，而增加了新的内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既然是这样一个组织，就不应该开一次会议就结束，而应该长期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个长期性的组织。这一点相信大家都是赞成的。

政协组织所包含的成分，是非常广泛的。它的任务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也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奋斗的目标。凡是同意这个目标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我们都欢迎他们的代表来参加这个会。而事实上，所有这些人现在都已经团结起来，并共同为这一目标而努力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在最近召开全体会议，全体会议闭幕后将设立全国委员会，领导实行全体会议的决议。另外在全国中心城市、重要地区和省会，根据需要设立地方委员会。现在各地召开的各界代表会议，实际上就是地方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可以说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方委员会。我们

要通过这个组织来进行地方的统一战线工作。由于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范围太大，不容易经常召集，所以只好拟定三年召开一次。至于地方委员会，可以适当多开一些。

在全国各地方未能实行普选以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它的地方委员会分别执行全国和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我们现在即将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便是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来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并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便是同中央人民政府协议事情的机构。一切大政方针，都先要经过全国委员会协议，然后建议政府施行。等到将来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土地改革的情况及人民进步的程度，才可能把普选由个别地方逐渐推广到全国，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才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但是它仍将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存在，国家大政方针，仍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地方委员会的情形也是如此。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负有伟大的建国责任的。建设新中国，必须经过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一切爱国人士共同努力，必须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参加。我们要很好地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团结一切人民力量，来完成这一伟大使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只打算写出人民政协的组织 and 任务，而不在工作方法方面详细列举，以免束缚工作的进行。希望各单位对这个草案讨论后提出意见，然后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来决定。

第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

这个组织法草案首先表明国家的制度是新民主主义，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是大家所同意的。现在只须解释一个问题，就是国名问题。在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案上去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二字，去掉的原因是感觉到“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须重复，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国名是“中华民国”，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可以作双关的解释，而且令人费解。现在我们应该把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区别开来。因为在辛亥革命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尚未成功，那时只能是旧民主主义的。在那以后由不完备的旧民主主义进步到完备的新民主主义。今天，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国家是属于四个民主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动的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分子不能列入人民的范围。等到他们彻底悔悟和改造后才能取得人民的资格。中国的少数民族也应该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承认他们的自治权。因此，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是很恰当的。

既然国名重新定了，是重新纪元呢，还是采用公元纪元？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上没有讲到，这将在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讨论决定。

关于国家制度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制。现在可以把起草时的想法提出来，请大家考虑。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但其特点是汉族占人口的最大多数，有四亿人以上；少数民族有蒙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夷族^[2]、高山族等，总起来，还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当然，不管人数多少，各民族间是平等的。首先是汉

族应该尊重其他民族的宗教、语言、风俗、习惯。这里主要的问题在于民族政策是以自治为目标，还是超过自治范围。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一定要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来挑拨离间中国的统一。如英帝国主义对西藏及新疆南部的阴谋，美帝国主义对于台湾及海南岛的阴谋。不错，这些地方是有少数民族的，但是他们一向是在中国领土之内。清朝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是对满族以外的民族进行欺骗和屠杀。北洋军阀政府继续了这样的政策，国民党反动政府更加深了这样的政策。我们应该改变这样的政策，把各民族团结成一个大家庭，防止帝国主义的挑拨分化。陈嘉庚先生这次到东北参观，同时也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他回来后说现在内蒙的汉、蒙二族合作得很好，犹如兄弟一样。这消息我们听了非常高兴，这足以证明我们民族政策的成功。

任何民族都是有自决权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今天到会的许多人是民族代表，我们特地向大家解释，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同意这个意见。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这一次民族方面的代表的确是比较少，这是一件遗憾的事，原因是有些少数民族的地方还没有得到解放，不容易找到代表来。内蒙古是解放了的，它便有了双重的代表，少数民族方面的代表和区域代表。

关于政权制度方面，大家已经同意采用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现在凡是通过普选方式产生出来的会，我们叫做大会，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凡是通过协商方式产生的会，我们就叫做会议，例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会

和会议名称的区别就在这里。将来人民代表大会，是要经过普选方式来产生的。关于普选，本来应该做到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记名的投票，但这对中国现在的情况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许多不是普遍选举的现象，例如根据阶级、民族、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性别等给普选加以种种限制。这种选举我们不要，我们要做到真正的普选，不分性别，不搞种族歧视，不分宗教信仰，不论财产多寡和教育程度的高低，只要达到适当年龄，没有其他特别原因，便可参加普遍的选举。关于直接选举的问题，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直接选举目前实在不容易办到。至于平等这一项，假如按人口做比例也不行，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那么选出来的代表就会大多数是农民，这种情形还不能够适应于今天革命的形势和要求。不记名的秘密投票方式，依照目前人民的文化程度来说，也是做不到的，许多地方只能用举手或投豆的方式。由于有上述种种的情况，我们只能强调提出普选一点，其他各项有待将来条件成熟时再逐步实现。单就普选一点，三年后能不能真正做到，还是一个难题。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我们只能逐步由客观条件成熟的地区先行普选。

关于政府组织问题，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系统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下面分设许多机构，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分工的。这一点相信大家不会反对，而我们所要反对的是旧民主主义的议会制度，因为它不是事前协商，只是便于剥削阶级政党间互相争夺，互相妥协，共同分赃的制度。他们幕后分侵略殖民地的赃，分剥削本国劳动人民所得的赃，争夺不休。而我们却是长期合作，不是彼此互相交替。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曹锟、段祺瑞等都搞过议会制、总统制等方式，结果换来了封

建买办的专政。这种痛苦的经验教训，在座的陈叔通老先生、沈钧儒老先生，都曾亲自体验过。到了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中国才找到一条好路，于是便有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情况又不同了，那时，大家为民主拼命奔走，也仅仅得出了一个伪宪法，真正的民主是没有的。这是我们都亲身经历过的经验教训。

现在，根据我们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系统，在人民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它是经过民主方式产生的。而对工作的经常指导，又是集中在由民主方式产生出来的主席身上。主席下面的组织，首先是政务院，其他还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

政务院底下，设有三十个单位，这个数目看起来很不少。清朝只有六个部，后来又分为八九个部，北洋军阀政府的国务院，也只有八九个部，但每个部下面却设有许多机关，有些机关连部长也管不了，直接由最高当局来指挥，造成官场上互相冲突、互相牵制的现象。这种情形，我们新中国是不允许的，所以政务院下设有三十个单位。事实上苏联今天有六十个部，比我们更多，当然我们也不是要模仿苏联，一切还是由本身的需要出发。

政务院不可能经常领导这三十个单位，所以下面设四个委员会协助办理。这四个委员会是：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下辖五个部门，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辖十六个部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辖六个部门。另外还有外交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和情报总署，是直属政务院的。一共是三十个单位，重点在于财政经济，其次是文化教育。这样做法会不会降低工作效率呢？根据

过去解放区政权建设的经验来说，是不会的，而且还可以把工作推行得既快又好。政务院下面设立人民监察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监察制度，监察行政部门，如公务人员是否执行了政府的决议和政策，是否有贪污腐化等情形。

军事方面，我们估计国内解放战争还要打一年左右，才能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反动派。因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要继续存在，同时将来也要领导巩固国防的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这不用多做解释。

至于地方的统一制度，目前因为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所以它的组织如何，只好留给将来中央人民政府去决定。

现在报告已经完了，请诸位根据这三个文件，多加考虑，提出更多更好的意见来共同商讨。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刊印。

注 释

〔1〕指宋庆龄。

〔2〕即彝族。

军委关于开好赣州会议及进军 华南部署给叶剑英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

叶方陈邓诸同志，并告林邓^{〔1〕}：

（一）你们业已聚会于赣州，极为欣慰。你们会议内容应照中央迭次电示及面告剑英者扼要做出决定。（二）方方等同志领导的华南分局及华南各地党委和人民武装有很大的成绩，新的华南分局及即将进入华南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应对此种成绩有足够而适当的估计，使两方面的同志团结融洽，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以利争取伟大的胜利。（三）你们一面开会，一面即可命两兵团^{〔2〕}开始向南进军。第一步进至韶关、翁源之线，准备在该线休息若干天，然后夺取广州。我们认为不应分兵去惠州，待夺取广州再占惠州为适宜。因为四野主力九月中旬即可向芷江、宝庆、衡州之线前进。白崇禧必然不战而向广西撤退（他决不会在湖南境内和我决战，所布疑阵是为迟滞我军前进之目的）。我陈邓两兵团应争取于十月下半月占领广州。陈兵团预计十一月进至梧州区域。四野主力则于同时进至柳州、桂林区域。十二月即可深入广西，寻找白部作战。刘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邓^{〔3〕}率二野主力，十一月可入贵州境内，十二月可入重庆。如此，则我各路军可以互相配合。你们对进军时间及攻击目标等项，有何意见，盼告。

军 委

申齐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指陈赓、邓华，林彪、邓子恢。

〔2〕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

〔3〕指刘伯承、邓小平。

军委关于歼灭白崇禧部的部署 给林彪、邓子恢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九月九日)

林邓：

关于进攻部署：（一）陈赓邓华两兵团第一步进占韶关、翁源地区，第二步直取广州，第三步邓兵团留粤，陈兵团入桂，包抄白崇禧后路。陈兵团不派任何部队入湖南境，即不派部去郴州、宜章等处。（二）程子华兵团除留一个军于常德地区，另一个军已到安化地区外，主力两个军取道沅陵、芷江直下柳州。（三）另以三个军经湘潭、湘乡攻歼宝庆之黄杰匪部，与程子华出芷江的两个军摆在相隔不远的一线上。对衡阳地区之白崇禧部，只派队监视，而不作任何攻歼他的部署和动作。（四）这样一来，白崇禧部非迅速向桂林撤退不可，而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判断白部在湖南境内决不会和我们作战，而在广西境内则将被迫和我们作战。因此，陈赓兵团不要派部出郴、宜。现在茶陵、攸县之我军，亦不要作攻歼衡阳白匪之部署，而应两路齐出芷江、宝庆，位于白匪西侧。然后，以芷江之两个军，先期突然出柳州，在柳州地区占立根据地。估计白匪三个军（第七军、第四十六军、第四十八军）及鲁道源之五十八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军在我主力威胁面前，不敢过早分散其主力。李品仙防御柳州一带之兵力必不甚多。我军（两个军）可能在柳州以西以北区域即融县、罗城、天河、宜山、思恩、宜北区域建立根据地，并切断柳州通贵州的铁道线。陈赓兵团则于占领广州后，即经梧州向宾阳、南宁地区前进，位于广西南部。我在宝庆之三个军（主力）则于白匪向桂林撤退时，尾敌南进。（五）以上三路我军（共八个军），在进入广西后，第一步不是急于寻找白匪主力作战，而是立稳脚跟，查明情况，联系群众和结合我在广西境内的游击部队（桂南、桂北均有）。第二步，再各个歼灭白匪主力。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我们认为非用上述方法，不能消灭他。（六）白崇禧的最后一条退路是云南。他以回云南的口号拉住了鲁道源，故在白、鲁退入广西后，可能即令鲁道源军或再配以一部桂军入云南。如果是这样，那时我们应考虑从陈赓兵团先抽一部（例如一个军）出云南，配合我在云南的游击队在云南先建立根据地。

军 委

九月九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五卷刊印。

毛泽东等关于 和平解放新疆的文电^{*}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日、十三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

—

德怀同志：

申齐一时电悉，答复如下：（一）集中注意力争取于十一月初、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二）由你们自己做准备的事项，请你抓紧进行，除帐篷、水壶、粮食外，你未提皮衣、皮帽、毡鞋，这些是很重要且须立即准备的，是否需要我们帮助你们办皮衣，要多少，请即告。（三）由我们做准备的事项是汽车三四百辆，银洋五十万元及单独在新疆用的人民币，这些是可以办到的，你们申支电要四千辆汽车，则是办不到的。（四）陶峙岳、赵锡光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包尔汉已派人至伊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本日我们邀张治中正式谈了，请他帮助解决新疆的问题，并在新疆方面担负工作任务（尚未提到具体职位），他表示愿意听候驱策，做什么事也可以，他谈新疆尚有六万军队，数万党政后勤，共约十万人左右。我们认为应设立西北军政委员

* 本篇二是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作了修改。

会，统辖西北五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工作，以彭德怀为主任，习仲勋、赵寿山、张治中、邓宝珊四人为副主任，办公地点在兰州或西安，以张治中为新疆军政委员会主任，王震及少数民族的二人至三人为副主任（或须加上陶峙岳），以为新疆的过渡机关。你可偕王震去迪化主持一时期，尔后可往来于陕甘新之间，以上方案大体上是否可行，请考虑电复。（五）我们和友方^[1]的民航协定，业已在大体上商好，他们帮我建立新甘陕三省间的运输毫无问题，三十架运输机，估计可以办到，但我们认为两个军步兵及炮兵的主力，均须步行及车运，要待占领迪化及迪化机场由我控制以后，方可要苏机帮我们运干部、粮食、被服及一部分兵力，而在占领迪化以前，估计可以帮我们运送双方谈判代表及重要人员。（六）翻译人员可要邓力群在新疆准备。

毛 泽 东

申灰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出版的
《新疆工作文献选编》刊印。

二

力群并告彭张^[2]：

十一日晚十二时电悉。

（一）同意你去迪化一星期仍回伊犁，尔后视情况往来于迪化伊犁之间。

（二）你见迪化当局，除将张治中致陶、包两电原文面交他们外，并向陶、包表示他们应立即派员至兰州与彭德怀副总司令洽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最好陶峙岳能乘飞机直飞兰州面

晤彭副总司令，张治中于新政协开会完毕后亦将往兰州晤陶。如陶自己愿往，或派代表前往，你可与友方商榷，问他们能否派飞机送陶或其代表往兰。

（三）陶峙岳所属部队应照原样在各区各县驻防，不要调动集中，待人民解放军入疆分别接防时再行调动集中编整，以免秩序混乱。

（四）你与陶、包见面后情况望随时电告。

中 央

申元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出版的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刊印。

三

彭德怀同志，并告西北局：

二十五日电悉。（一）陶峙岳派曾震五来兰谈判是试探性的，你们应对曾震五做工作，争取他站在我们方面，而不着重谈判新疆问题的具体解决方面，因在我军入新以前谈不到具体解决。（二）曾震五今冬不要进军的意见，你们也不要驳他，即不要表示今冬一定进军。但在实际上，你们应确切地于十一月一日或十月以前准备完毕（皮衣、皮帽、毡鞋、水壶、汽车、汽油、粮食、现洋、钞票等等及最重要的政治动员和干部准备），以便在十一月月上旬或中旬实行进军。主力准备车运及步行，一部准备空运。我们除为你们准备四百辆汽车及皮衣、现洋、钞票等事而外，正在为你们交涉三十架至五十架运输机。（三）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在此基础上迫使国民党就范（国民党军队及党政大概有七八万人，号称

十万人)，并使张治中、陶峙岳、刘孟纯等为我们服务，使新疆能够和平地少破坏地接收过来，并有秩序地改编国民党军队。张治中可待十一月我军开始前进时，来兰州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会（已与贺^{〔3〕}谈过，就边区政府基础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彭为主任，习仲勋、张治中为副主任），然后和彭一道入新。（四）新疆的统帅机构应是新疆军政委员会，彭兼主任，王震、张治中、包尔汉为副主任。省政府改组，包尔汉应仍为主席。委员应是汉人占少数，维族及其他族占多数（现在包尔汉省政府是汉人十名，维族等十五名，我们入新不要变更这个比例）。这一基本方针已取得包尔汉及迪化友人方面的同意，请你们加以注意。（五）甘、青可以不成立军政委员会。陕甘青三省府的人选可以照你们所拟办理，即陕省府以马明方为主席，甘省府以邓宝珊为主席，王世泰为副主席，青省府以赵寿山为主席。（六）入川军事，待邓小平到平谈妥后再告。

毛 泽 东

九月二十六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刊印。

四

陶峙岳将军及所属部队将士们：

包尔汉主席及所属政府工作人员们：

你们在九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

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毛 泽 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刊印。

注 释

- 〔1〕指苏联。
- 〔2〕指张宗逊。
- 〔3〕指贺龙。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

毛 泽 东

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美国资产阶级发言人艾奇逊，不但是因为艾奇逊明确地供认了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这样一种事实，使得中国的先进分子有证据地去说服落后分子。不是吗？你们看，艾奇逊自己招认了，最近数年的这一场使得几百万中国人丧失生命的大血战，是美国帝国主义有计划地组织成功的。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又不但是因为艾奇逊公开地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的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美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还因为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而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驳斥了艾奇逊，就有可能使得广大的中国人获得打开眼界的益处。对于那些抱着和艾奇逊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观点的人们，则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艾奇逊胡诌的中国近代史是什么呢？他首先试图从中国的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经济状况和思想状况去说明中国革命的发生。在这里，他讲了很多的神话。

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党在法典里写上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

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很有点像。人口太多了，饭少了，发生革命。国民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发生了。

按照艾奇逊的说法，中国是毫无出路的，人口有了四亿七

千五百万，是一种“不堪负担的压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总之是不得了。艾奇逊在这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个希望他没有说出来，却被许多美国新闻记者经常地透露了出来，这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北伐战争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蒋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成了压迫和剥削中国人的反革命首领。

“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吗？西北、华北、东北、华东各个解决了土地问题的老解放区，难道还有如同艾奇逊所说的那种“吃饭问题”存在吗？美国在中国的侦探或所谓观察家是不不少的，为什么连这件事也没有探出来呢？上海等处的失业问题即吃饭问题，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几年工夫，就可以和华北、东北等处一样完全地解决失业即吃饭的问题。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根据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

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西方的影响”，这是艾奇逊解释中国革命所以发生的第二个原因。艾奇逊说：“中国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大体上不曾沾染外来的影响。中国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后总是能够驯服和融化侵入者。他们自然会因此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类的最高表现。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在中国孤立的墙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这些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于这些品质，一部分由于清朝统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融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

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艾奇逊说得很有点像。西方的新观念输入了中国，引起了革命。

革什么人的命呢？因为“清朝统治的衰落”，向弱点进攻，是革清朝的命了。艾奇逊在这里说得不恰当。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

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在这个影响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并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

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艾奇逊是帝国主义政府的发言人，他当然一个字也不愿意提到帝国主义。他将帝国主义的侵略，说成“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看啊，多么美丽的名称——“进取性”。中国人学了这种“进取性”，不是进取到英国或美国去，只是在中国境内引起了“骚动和不安”，即是革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命。可惜没有一次成功，都给“进取性”的发明人即帝国主义者打败了。于是掉转头去学别的东西，很奇怪，果然一学就灵。

“中国共产党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罗斯革命的思想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艾奇逊说对了。这种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思想，和艾奇逊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进中国的高度文化”相比较，不知要高出几多倍。其明效大验，就是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可以被艾奇逊们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

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非常奇怪，“苏维埃的学说和实践，对于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原则，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和党的组织方面，有相当的影响”。被艾奇逊们所傲视的西方的“高度文化”，对于孙先生的影响怎么样呢？艾奇逊没有说。孙先生以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结果是失望，转而“以俄为师”，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显然不是。孙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一齐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拼命，当然不是偶然的。在这里，艾奇逊不敢说苏联人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孙中山是向侵略者学习。那末，好了，孙中山可以向苏联人学习，而苏联人并非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什么孙中山的继承者，孙中山死后的中国人，就不可以向苏联人学习呢？为什么孙中山以外的中国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了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并使之和中国的特点相结合，发动了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就叫做“受苏联控制”，“共产国际的第五纵队”，“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呢？世上有这样高明的逻辑吗？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

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

至此为止，艾奇逊以一个资产阶级大学教授讲述无聊课本的姿态，向人们表示他在寻求中国事变的因果关系。中国之所以发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你们看，他好像是一个因果论者。接下去，他就连这点无聊的伪造的因果论也不见了，出现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变。中国人就是那样毫无原因地互相争权夺利和猜疑仇恨。斗争中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精神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一方极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极度上升，升到狂热的程度。什么原因呢？谁也不知道——这就是艾奇逊所代表的美国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逻辑。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毛泽东、朱德复董其武电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

董其武将军及在贵将军领导下的绥远军队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们：

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刊印。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毛 泽 东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

我们的会议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指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

这种全国人民大团结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战胜了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有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反攻和进攻。现在，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军已经打到接近台湾，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和新疆的地区去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已经获得了解放。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援助人民解放军，反对了自己的敌人，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今天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

*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

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那次会议的唯一收获是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

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

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

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

公里的国土。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够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庆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留用旧人员 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各中央局，各分局并转各省委，各野战军前委，平津两市委：

(一) 在我新接收的城市中，对旧人员的处理应十分慎重。这些人员，除少数战犯、特务，及劣迹昭著的分子以外，一般均将其希望寄托于我们，其基本要求是吃饭。京、沪、杭解放后，把旧人员裁了二万七千余人，引起很大波动。北平和平解决后，遣散傅^[1]部军官一万七千人，均逃到绥远，怨天恨地，现在仍须由我负担解决。所有这些经验说明，旧人员一般地不能用裁撤、遣散方法解决，必需给以工作和生活的出路。

(二) 党及人民政府有改造和在工作中养活这些人的责任，我们准备在全国解放后在一定期间内，包括新旧军政人员在内总共在工作中养活九百万到一千万人，这在财政上必然会有很大困难，但是可以解决的，而在政治上有十分必要。

(三) 对已解放城市，如京、沪、汉、长沙、兰州等，及将解放城市，如广州、重庆、迪化、台湾等，接收之国民党旧工作人员，除作恶多端、严重贪污及依靠门子吃饭的分子等而为群众所十分不满者，应予撤职并依法办理外，一般均应予以留用。但一不是原职原薪，二不是原封不动。要同这些留用人员说明人民与政府的困难，适当降低待遇，三个人的饭五个人

匀着吃，房子挤着住。

（四）一切人民政府机关、财经机关，特别是企业机构，均须改变国民党官僚主义效率低下的作风，闲杂人员及庞大的机关应加以精简。但对精简下来的人员，不可踢开不管，而应举办大的训练班，受训期间照减低后的薪资打六折至七折（薪水低的可少打折扣）发给，以保证他们及其家属的生活。学习成绩须认真加以考核，量材录用，学习好的优先录用。

以上各点，望即遵照执行。

中 央

申 马

根据《党的文献》二〇〇九年第五期
刊印。

注 释

〔1〕指傅作义。

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周恩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是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三小组决定由中国共产党负责起草的。草案初稿写出以后，经过七次的反复讨论和修改，计由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五六百人分组讨论两次，第三组本身讨论了三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两次，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将草案提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了基本通过，现在提交政协全体会议讨论。协商过程中着重讨论到的有如下几个问题，现在加以说明。

第一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问题。这种统一战线的发起远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提议和努力，获得了孙中山先生的同意，改组了国民党，促成了国共合作，胜利地举行了北伐。后来这个统一战线被蒋介石破坏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努力组织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尤其是毛泽东同志更使这个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成功。可是国民党反动派是始终反对统一战线的，它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动三次反共高潮，而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又推翻双十协议和政协

* 这是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报告的摘要。

决议，最后终于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这次内战教育了人民，使广大人民逐渐地走到一致拥护人民解放军进行解放战争，消灭反动派，把革命进行到底。去年中国共产党根据历来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得到了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热烈的响应。发展到今天，这个号召已经实现了。大家的目的很明确，正如共同纲领草案和人民政协组织法所规定的那样，是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为着这个任务，我们团结国内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和国外华侨，结成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了二十八年的主张，也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区域、军队、国内少数民族、国外华侨，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所拥护和赞助的。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论文中，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保证了人民民主革命取得今天的胜利。所以在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形成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大家同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它的最好的组织形式。

在讨论中曾经出现过两种其他的想法：第一种以为等到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就再不需要人民政协这样的组织了；第二种以为由于各党派这样团结一致，推动新民主主义很快地发展，党派的存在就不会很久了。后来大家在讨论中认为这两种想法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不合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建设的需要。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固然还需要一个相当时间，就是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

后，政协会议还将对中央政府的工作起协商、参谋和推动的作用。其次，新民主主义时代既有各阶级的存在，就会有各党派的存在。旧民主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是资产阶级，其所属各派必然是互相排挤，争权夺利。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各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虽然各阶级的利益和意见仍有不同之处，但是在共同要求上、在主要政策上是能够求得一致的，筹备会通过的共同纲领草案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明。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同要求和矛盾，在反帝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前面，是可以而且应该得到调节的。

第二是新民主主义的总纲问题。在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以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就应该明确地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

总纲中关于人民对国家的权利与义务有很明显的规定。有一个定义须要说明，就是“人民”与“国民”是有分别的。“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而对官僚资产阶级在其财产被没收和地主阶级在其土地被分配以后，消极的是要严厉镇压他们中间的反动活动，积极的是更多地要强迫他们劳动，使他们改造成为新人。在改变以

前，他们不属人民范围，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暂时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使他们遵守国民的义务。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对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团结和生产有利的。

这些反动阶级中的重要反动分子们，决不会甘心失去他们过去的特权，一定要进行阴谋破坏的。最近杨杰将军的遇害，便是一个例证。人民的军队和警察将加强工作以防止他们的阴谋破坏。我们大家则须加强团结，提高警惕，以打击反动分子的各种阴谋。

第三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问题。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它完全不同于旧民主的议会制度，而是属于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代表大会制度的范围之内。但是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制度，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而我们则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我们的这个特点，就表现在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的形式上。政府各部门和现在各地的人民代表会议以及将来的人民代表大会都将同样表现这个特点。从人民选举代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人民政府直到由人民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政权的这一整个过程，都是行使国家政权的民主集中的过程，而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就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第四是军事制度问题。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胜利和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决不是偶然的。它的特点不仅是勇敢机智善于作战，而且能正确地执行政策，并帮助人民劳动。政治工作制度是它的灵魂。这种军事制度，不仅不同于封建军阀，也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军事制度。纲领上规定将

以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军事制度来统一全国的军队，这里边包括一切从国民党反动统治方面起义过来的军队。这种做法显然不同于军阀制度的吞并排挤，而是不分彼此帮助他们改造为人民的军队。

第五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问题。基本精神是照顾四面八方，就是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的构成中，国营经济是领导的成分。在逐步地实现计划经济的要求下，使全社会都能各得其所，以收分工合作之效，这是一个艰巨而必须实现的任务。筹备期中关于经济的部分讨论最多，各方面好的意见都已经集中在草案的条文里面。经济建设是百端待举，但须有缓急轻重之分，草案中已根据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哪些是现在可以做的、哪些是现在不能做的；哪些是已经做了的、哪些是尚未做的等分析规定出具体条文。

第六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问题。这个问题讨论不多，简单地说来，就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草案中规定了必须强调的几项，其他没有规定的并非不作，因为在草案第五章中已经都概括地提到了。

第七是新民主主义的民族政策问题。其基本精神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必须反对各民族的内部的公敌和外部的帝国主义。而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又必须经常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各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武装权利及其宗教信仰之被尊重，均在条文中加以明确的规定。

第八是新民主主义的外交政策问题。草案第七章中明确地

规定了保障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即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总纲上已明白地接受了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论述的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起的方针。这就是我们在外交政策上的基本态度。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其基本内容^{*}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董 必 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案是人民政协筹备会第四小组负责草拟的。本组组长、副组长和组员一共二十五人，参加筹备会的二十三个单位，除了文化界民主人士以外，均有代表参加，民盟、民进和民主教授三单位且均有两位代表参加。六月十八日举行第一次小组全体会，会上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因没有准备，没有参考资料，有点漫谈的性质，于是推举张志让等七人成立提纲起草委员会，先准备一个讨论提纲，以便小组全体会上讨论时，可获得若干基本的共同意见。七月八日本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就根据提纲起草委员会所提“政府组织法中的基本问题”进行讨论。对于国家名称，国家属性，政府组织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目前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产生的方法，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组织，最高行政机构的名称，政务院与各部会间应否设立联络指导机关，政务院下面部会数目的多寡，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署的组织 and 隶属关系等问题，逐一讨论，基

* 这是董必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本意见趋于一致，有些意见仍留待起草委员会去斟酌，并推定了董必武、张奚若、阎宝航、王昆仑、张志让等五人负责起草政府组织法的初步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先后开会三次，并征询了钱端升、王之相、邓初民等专家的意见，写成了政府组织法的草案初稿，乃于八月十七日召开本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了组织法的初步草案，提交新政协筹备会的常务委员会。八月二十六日第四次常务委员会指定了黄炎培、马叙伦、张奚若、李立三和本人对初步草案再研究修改一次。九月十三日第五次常务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作文字修改后，在九月十七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中作了原则的通过，准备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会上去讨论。

关于这个组织法草案的总纲，我有以下说明：

第一，国家的名称问题：本来过去许多人写文章或演讲都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经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及爱国民主分子，它有确定的解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第二，国家的属性问题：第四小组的全体组员都觉得这一点应该明确地写在政府组织法之内。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所以必须把今天人民民主专政中阶级间的关系讲清楚。“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和“四个阶级联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特质，这是大家所同意的。经

过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及《论联合政府》这两本书的解释，经过他前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报告，今年六月十五日在新政协筹备会开幕典礼上的报告以及七月一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中的多次解释，并经过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实践，各民主党派在纲领和宣言中的表示，都确定了我们国家的这个特质。

第三，政府组织的原则：这个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它具体的表现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民主集中原则的提出，正是针对着旧民主主义三权分立的原则。欧美资产阶级故意把他们专政的政府分为立法、行政与司法三个机体，使之互相矛盾，互相制约，以便于他们操纵政权。旧民主主义的议会制度是资产阶级中当权的一部分人容许另一部分的少数人，所谓反对派，在会议讲台上说空话，而当权者则紧握着行政权柄，干有利于本身统治的事情。这是剥削阶级在广大人民面前玩弄手腕、分取赃私，干出来的一种骗人的民主制度。司法是最精巧的统治工具，同样是为当权的阶级服务的。我们不要资产阶级骗人的那一套。我们的制度是议行合一的，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各级人民政府。

第四，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出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出的全国委员会即成为国家政权以外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协议机关。

第五，本法草案所规定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职权，各国宪法多规定为国家元首的职权。我们觉得本法草案的规定，更能充分表现民主的精神。

第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辖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关于政务院的名称，原来有人主张用国务院，但国务院包括军事，不太合适；有人主张用行政委员会，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是委员会，最高行政机关下还有指导性的委员会一级，其下还有各种委员会，这样名称容易混淆。至于部长会议或部会长会议也不合乎我们的实际，在我们的最高行政机关中，部长不一定是政务委员。所以最后我们仍采用了政务院的名称。

对本法草案的第一章，我要说明的，就是以上六点。

关于第二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我想作下列三点说明：

第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而不设主席团，也不设常务委员会。苏联采行联邦制，有十六个共和国，每一共和国在中央有一位副主席，所以自然组成了主席团。我们没有这个事实，也就不必仿行此制。至于日常事务，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互选之秘书长领导办公厅人员经常处理。

第二，对第七条政务院总理的名称，在第四小组的会议中曾有所讨论，大多数组员认为如称院长易与法院院长、科学院院长混淆，大家尤其不赞成我们新的行政首长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行政院长用同一个名称，所以草案中采用了政务院总理的名称。

第三，第七条有“批准任免”的字样，因为有的行政区和省市的人民政府，其主席、副主席如果是选举出来的，则中央人民政府只批准其任命。后面第十五条也仿此。

关于第三章政务院，我想作以下四点说明：

第一，政务委员得兼任各部部长及各委员会主任，这就是说，部长和主任委员不一定是政务委员。我们政务院下有三十个部、会、院、署、行，如果它们的首长都是政务委员，再加

不任部长的政务委员，则政务委员人数太多，政务会议也就不易开好。

第二，关于联系与指导性的委员会，如政法、财经、文教等委员会是否列一级的问题，在第四小组的讨论中，曾经有三种意见：（一）算作一级，像现在组织法上所写的那样。（二）不算一级，不发号施令。（三）不规定是否算一级，由事实发展去决定。现在政务院下有三十个部门，如果每周开一次政务会议，一个部门的工作，每月无法轮到讨论一次。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故肯定把它列为一级，以便联系和指导与其工作有关的各部门工作。这样，各部门的工作是受双重领导，一方面受政务院的领导，另一方面又受其所隶属的指导委员会的领导。

第三，人民监察委员会是监察行政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的，与检察署不同。有人主张它应隶属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地位高些，职权也较大；也有人主张它隶属政务院，比直接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更好些，因为与行政机关接近，熟悉实际情况，更便于执行职务，而且人民监察委员会所起作用之大小，实际上要看主持者是否负责及此机构是否被重视而定。我们同意后一主张，所以起草时就把监察委员会列在政务院下。

第四，政务院下设的专管行政部门共有三十个，这是因为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应转向建设，不能不多设几个部门去管财政经济工作。我们还有许多工作部门没有列为政务院专管行政部门，如合作事业，如盐务等都属于这一类。我们在草案第二十二条中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于政务院的各委、部、会、院、署、行、厅于必要时得决议增加、减少或合并之。有了这样有弹性的条文，政府便好办事了。

最后我想对组织系统表简单说几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虽然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但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出之后，后者即为行使全国最高政权的机关，所以组织系统表中用虚线表示其关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闭会后的全国委员会对政府仅提出建议案，故亦以虚线表示之。

政务院下，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和人民监察四个委员会，地位较高，故在图中的部位亦较高。政治法律委员会所指导的部门以黄色实线表示之；财政经济委员会所指导的部、行、署以红色实线表示之；文化教育委员会所指导的部、院、署则以绿色实线表示之。政务院对三个指导性的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以及各部、会、署、院、行均有直接指挥之权，以黑色实线表示之。外交部对情报总署，财政部对人民银行，贸易部对海关总署有监督指导之权，亦以黑色实线表示之。

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已印发了，请各代表先生审查后付之公决。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董必武选集》刊印。

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是中国光辉灿烂的人民的新世纪的开端。这是全中国人民空前大团结的会议。这个会议宣告了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这个会议，在全世界进步人类为世界和平民主事业与人类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伟大斗争中，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永远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旗帜之下，中国人民日益坚强地团结存来，结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继八年抗日战争打倒了一个日本帝国主义之后，仅仅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就已经基本上打倒了由美帝国主义所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反动派，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期，并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继续推进向全国的彻底胜利。在这个基础上所召开的包括全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人物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要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制定中国人民自己的宪章，组织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

全国人民早已渴望着召开这样的一个真正由人民自己做主人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人民都鲜明地记得，在一九四六年一月间所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所破坏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支持者美国帝国主义，以中国人民为可欺，撕毁了它们在人民面前亲手所签订的一切协定，发动反革命的战争，残酷地反对中国人民，召集了分裂的独裁的伪“国大”，妄想为所欲为。但在一九四八年的五月一日，正当伪“国大”完结的那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愿望，发出了对时局的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伟大的号召，配合着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民主运动的前进，立即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国内外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我们今天终于看到了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民主运动胜利地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胜利地召开了人民自己的政治协商会议。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胜利。

从三年前的那个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到今天这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划分了两个根本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短短三年间的历史事实，最后一次证明了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穷凶极恶，证明了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举行人民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统治，而建立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年的历史，把这个真理证明得如此生动而丰富，使中国人民普遍地经过自己的经验认识了这个真理。这就保证了反动派的旧中国必然永远灭亡，而人民的新中国必然永远胜利。这也就决定了中国人民所要建立的新的国家制度，必须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有了这个国家制度，我们就能够保障中国人民

民主革命胜利的伟大成果；有了这个国家制度，我们就有力量随时击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在中国企图复辟的阴谋。这个国家的政权，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中的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是对于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他反革命残余势力实行专政的政权。中国人民能够得到这样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政权形式，是经过了近一百年无数革命先烈前仆后继牺牲奋斗而来的，特别是经过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的英勇斗争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年的艰苦奋战而来的。中国人民为了寻求和创造这样的国家制度和政权形式，已经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代价，因此中国人民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积极参加到世界爱好和平自由的各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坚决地一边倒，与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亲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击碎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们任何的挑衅，保卫世界的持久和平，为彻底完成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并为中国和世界人民共同的美好的未来而继续奋斗前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是极为重大的，但是，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及其代表是一定能够完成这些任务的。从此，全世界的人都将看到中国人民以空前英勇的姿态站起来，成为有高度文明的新社会新国家的光荣的主人。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中国人民政协）为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旨在经过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团结，去团结全中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共同努力，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肃清公开的及暗藏的反革命残余力量，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并发展人民的经济事业及文化教育事业，巩固国防，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国家，以建立及巩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及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章 参加单位及代表

第二条 凡赞成本组织法第一条之规定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经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协商同意，得参加中国人民政协；个人经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协议邀请者，亦得参加

中国人民政协的全体会议，并得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

第三条 每届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参加单位、名额及代表人选，由上届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协商定之，但第一届由中国人民政协筹备会协商定之。

第四条 凡经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及全国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各参加单位及代表均有信守及实行的义务。

凡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的民主党派或人民团体，对全体会议及全国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如有不同意时，除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负责遵行不得违反外，其有不同意见得保留之，以待下届会议提出讨论；如对重要决议根本不同意时，有声请退出中国人民政协的自由。

第五条 中国人民政协的参加单位或代表或全国委员会委员，如有违反中国人民政协的组织法、共同纲领或重要决议而情节严重者，得由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或全国委员会视其情节严重的程度，分别予以警告，撤换代表，撤销委员资格或撤销参加单位等处分。由全国委员会所给予的处分，如被处分者不服，得向下届全体会议提出申诉。

第三章 全体会议

第六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每三年开会一次，由全国委员会召集之。全国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时，得提前或延期召集之。但第一届由中国人民政协筹备会召集之。

第七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职权如下：

- 一、制定或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 二、制定或修改由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共同遵守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同纲领；

三、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甲、制定或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乙、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丙、就有关全国人民民主革命事业或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或重要措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决议案。

四、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建议案；

五、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

第八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须有参加代表过半数的出席，始得开会；须有出席代表过半数的同意，始得通过决议。

第九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设主席团，由全体会议选举之。主席团名额，由每届全体会议临时规定之。

第十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设秘书长一人，由全体会议选举之。设副秘书长若干人，由主席团选任之。在秘书长及副秘书长之下，设秘书处。

第十一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得设各种委员会，其组织办法另定之。

第十二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议事规则，由主席团制定之。

第四章 全国委员会

第十三条 在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闭幕后，设立全国委员会。其职权如下：

一、保证实行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及全国委员会的决议；

二、协商并提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案；

三、协助政府动员人民参加人民民主革命及国家建设的工作；

四、协商并提出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的各单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中的联合候选名单；

五、协商并决定下届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参加单位、名额及代表人选，并召集之；

六、指导地方民主统一战线的工作；

七、协商并处理其他有关中国人民政协内部合作的事宜。

第十四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及候补委员，由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选举之；其名额由每届全体会议临时规定之。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每半年开会一次，由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集之。常务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时，得提前或延期召集之。

第十五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互选常务委员若干人，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组织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

第十六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设秘书长一人，由全国委员会选举之。设副秘书长若干人，由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选任之。在秘书长及副秘书长之下，设秘书处。

第十七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工作条例，由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之。

第五章 地方委员会

第十八条 在中心城市、重要地区及省会，经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决议，得设立中国人民政协地方委员会，为该地方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协商并保证实行决议的机关。

第十九条 中国人民政协地方委员会的组织条例，由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制定或批准之。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组织法经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通过后施行。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出版的《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刊印。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

第三条 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第四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

第五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政务院，以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组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为国家军事的最高统辖机关；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以为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及检察机关。

第二章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第六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人，副主席六人，委员五十六人，并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互选秘书长一人组成之。

第七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行使下列的职权：

- 一、制定并解释国家的法律，颁布法令，并监督其执行。
- 二、规定国家的施政方针。
- 三、废除或修改政务院与国家的法律、法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
- 四、批准或废除或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订立的条约和协定。
- 五、处理战争及和平问题。
- 六、批准或修改国家的预算和决算。
- 七、颁布国家的大赦令和特赦令。
- 八、制定并颁发国家的勋章、奖章，制定并授予国家的荣誉称号。
- 九、任免下列各项政府人员：
 - 甲、任免政务院的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和秘书长、副秘书长，各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各部的部长、副部长，科学院的院长、副院长，各署的署长、副署长及银行的行长、副行长。
 - 乙、依据政务院的提议，任免或批准任免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和主要的行政人员。
 - 丙、任免驻外国的大使、公使和全权代表。

丁、任免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委员，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副总司令，总参谋长、副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和副主任。

戊、任免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和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和委员。

十、筹备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八条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并领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工作。

第九条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秘书长，协助主席执行职务。

第十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两个月举行一次，由主席负责召集。主席根据需要，或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请求，或政务院的请求，得提前或延期召开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须有委员过半数的出席始得开会，须有出席委员过半数的同意始得通过决议。

第十一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设办公厅，并根据需要，得设其他附属工作机构。

第十二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组织条例，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之。

第三章 政 务 院

第十三条 政务院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总理一人，副总理若干人，秘书长一人，政务委员若干人组成之。政务委员得兼任各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和各部的部长。

第十四条 政务院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休会期间，对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

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十五条 政务院根据并为执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国家的法律、法令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规定的施政方针，行使下列职权：

一、颁发决议和命令，并审查其执行。

二、废除或修改各委、部、会、院、署、行和各级政府与国家的法律、法令和政务院的决议、命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

三、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议案。

四、联系、统一并指导各委、部、会、院、署、行及所属其他机关的相互关系，内部组织和一般工作。

五、领导全国各地方人民政府的工作。

六、任免或批准任免第七条第九款乙项规定以外的各县市以上的主要行政人员。

第十六条 政务院总理主持政务院全院事宜。政务院副总理和秘书长协助总理执行职务。

第十七条 政务院的政务会议，每周举行一次，由总理负责召集。总理根据需要，或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政务委员的请求，得提前或延期召开会议。政务院的会议，须有政务委员过半数的出席始得开会，须有出席政务委员过半数的同意始得通过决议。政务院的决议和命令，以总理单独签署行之，或由总理签署外并由有关各委、部、会、院、署、行的首长副署行之。

第十八条 政务院设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和下列各部、会、院、署、行，主持各该部门的国家行政事宜：

内务部；

外交部；
情报总署；
公安部；
财政部；
人民银行；
贸易部；
海关总署；
重工业部；
燃料工业部；
纺织工业部；
食品工业部；
轻工业部（不属上述四部门之工业）；
铁道部；
邮电部；
交通部；
农业部；
林垦部；
水利部；
劳动部；
文化部；
教育部；
科学院；
新闻总署；
出版总署；
卫生部；
司法部；
法制委员会；

民族事务委员会；

华侨事务委员会。

政治法律委员会指导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工作。

财政经济委员会指导财政部、贸易部、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铁道部、邮电部、交通部、农业部、林垦部、水利部、劳动部、人民银行和海关总署的工作。

文化教育委员会指导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科学院、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的工作。

为进行工作，各负指导责任的委员会得对其所属各部、会、院、署、行和下级机关，颁发决议和命令，并审查其执行。

人民监察委员会负责监察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

第十九条 各部、会、院、署、行，在自己的权限内，得颁发决议和命令，并审查其执行。

第二十条 政务院设秘书厅，办理日常事务，并管理文书档案和印铸等事宜。

第二十一条 政务院及各委、部、会、院、署、行、厅的组织条例，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或批准之。

第二十二条 各委、部、会、院、署、行、厅，于必要时，得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议增加，减少，或合并之。

第四章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第二十三条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管辖并指挥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

第二十四条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

第二十五条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织及其管理和指挥系统，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之。

第五章 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

第二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并负责领导和监督全国各级审判机关的审判工作。

第二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设院长一人，副院长若干人，委员若干人。

第二十八条 最高人民检察署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之严格遵守法律，负最高的检察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最高人民检察署设检察长一人，副检察长若干人，委员若干人。

第三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的组织条例，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之。

第六章 本组织法的修改权及解释权

第三十一条 本组织法的修改权，属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在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本组织法的解释权，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出版的《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刊印。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 国歌、国旗的四个决议案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一、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

二、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一九四九年。

三、全体一致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四、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二〇〇九年出版的《人民政协重要文献
选编》(上)刊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序 言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已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宣告结束。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必须负责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解放中国全部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第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

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

第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均有保卫祖国、遵守法律、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公共财产、应征公役兵役和缴纳赋税的义务。

第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即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和人民警察，是属于人民的武力。其任务为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保卫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和一切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努力巩固和加强人民武装力量，使其能够有效地执行自己的任务。

第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第二章 政权机关

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

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第十三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组织成分，应包含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

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得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及其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

第十四条 凡人民解放军初解放的地方，应一律实施军事管制，取消国民党反动政权机关，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线军政机关委任人员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建立革命秩序，镇压反革命活动，并在条件许可时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军事管制时间的长短，由中央人民政府依据各地的军事政治情况决定之。

凡在军事行动已经完全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彻底实现、各界人民已有充分组织的地方，即应实行普选，召开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

第十五条 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主要原则为：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并报告工作。人民政府委员会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委员会内，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各下级人民政府均由上

级人民政府加委并服从上级人民政府。全国各地地方人民政府均服从中央人民政府。

第十六条 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人民政府间职权的划分，应按照各项事务的性质，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法令加以规定，使之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

第十七条 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

第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第十九条 在县市以上的各级人民政府内，设人民监察机关，以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和各种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并纠举其中之违法失职的机关和人员。

人民和人民团体有权向人民监察机关或人民司法机关控告任何国家机关和任何公务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第三章 军事制度

第二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

第二十一条 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根据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教育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第二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并建

设空军和海军，以巩固国防。

第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兵制度，保卫地方秩序，建立国家动员基础，并准备在适当时机实行义务兵役制。

第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

第二十五条 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的家属，其生活困难者应受国家和社会的优待。参加革命战争的残废军人和退伍军人，应由人民政府给以适当安置，使能谋生立业。

第四章 经济政策

第二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二十七条 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

第二十八条 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

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

第二十九条 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

第三十条 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

第三十一条 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

第三十二条 在国家经营的企业中，目前时期应实行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厂长领导之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私人经营的企业，为实现劳资两利的原则，应由工会代表工人职员与资方订立集体合同。公私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人民政府应按照各地各业情况规定最低工资。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保护青工女工的特殊利益。实行工矿检查制度，以改进工矿的安全和卫生设备。

第三十三条 中央人民政府应争取早日制定恢复和发展全国公私经济各主要部门的总计划，规定中央和地方在经济建设上分工合作的范围，统一调剂中央各经济部门和地方各经济部门的相互联系。中央各经济部门和地方各经济部门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各自发挥其创造性和积极性。

第三十四条 关于农林渔牧业：在一切已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

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并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的每一步骤均应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相结合。人民政府应根据国家计划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争取于短时期内恢复并超过战前粮食、工业原料和外销物资的生产水平，应注意兴修水利，防洪防旱，恢复和发展畜力，增加肥料，改良农具和种子，防止病虫害，救济灾荒，并有计划地移民开垦。

保护森林，并有计划地发展林业。

保护沿海渔场，发展水产业。

保护和发展畜牧业，防止兽疫。

第三十五条 关于工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的生产，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

第三十六条 关于交通：必须迅速恢复并逐步增建铁路和公路，疏浚河流，推广水运，改善并发展邮政和电信事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建造各种交通工具和创办民用航空。

第三十七条 关于商业：保护一切合法的公私贸易。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在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内实行国内贸易的自由，但对于扰乱市场的投机商业必须严格取缔。国营贸易机关应负调剂供求、稳定物价和扶助人民合作事业的责任。人民政府应采取必要的办法，鼓励人民储蓄，便利侨汇，引导社会游资及无益于国计民生的商业资本投入工业及其他生产事业。

第三十八条 关于合作社：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

自愿原则，发展合作事业。在城镇中和乡村中组织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在工厂、机关和学校中应尽先组织消费合作社。

第三十九条 关于金融：金融事业应受国家严格管理。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禁止外币在国内流通。外汇、外币和金银的买卖，应由国家银行经理。依法营业的私人金融事业，应受国家的监督和指导。凡进行金融投机、破坏国家金融事业者，应受严厉制裁。

第四十条 关于财政：建立国家预算决算制度，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范围，厉行精简节约，逐步平衡财政收支，积累国家生产资金。

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

第五章 文化教育政策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第四十二条 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

第四十三条 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

第四十四条 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

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

第四十五条 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奖励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发展人民的戏剧电影事业。

第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

第四十七条 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

第四十八条 提倡国民体育。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

第四十九条 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禁止利用新闻以进行诽谤，破坏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发展人民广播事业。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

第六章 民族政策

第五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

第五十一条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

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

第五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均有按照统一的国家军事制度，参加人民解放军及组织地方人民公安部队的权利。

第五十三条 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第七章 外交政策

第五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第五十五条 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第五十六条 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第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第五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

第五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保护守法的外国侨民。

第六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外国人民因拥护人民利益参加和平民主斗争受其本国政府压迫而避难于中国境内者，应予以居留权。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出版的《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刊印。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毛 泽 东

全国同胞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这次会议，包含了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表现了全国人民的空前的大团结。

这种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斗，战胜了美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之后所获得的。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其中杰出者有如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领导广大的人民，进行了不断的斗争，百折不挠，再接再厉，到现在，终于达到了目的。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

* 这是毛泽东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委托起草的会议宣言。其中“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一句，是会议通过宣言时代表们提议增加的。

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我们的会议齐心协力，按照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采用了义勇军进行曲为现时的国歌，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世界公元，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全国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它将保卫人民的利益，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它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它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

强的新中国。

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而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

冷 溶	李 捷	边彦军	度 平	费虹寰
郝首栋	王玉强	沈雁昕	曹前发	吕小蓟
王纪一	左智勇	杨 光	吕 臻	朱 薇
唐 蕊	祝志伟	胡鹏飞	单劲松	付 闪
朱舒坤	李凤龙			

参加部分篇目审核和资料工作的有：

廖心文	熊华源	唐洲雁	龙平平	万建武
王 萍	马京波			

中央档案馆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

杨冬权	李明华	许卿卿	王绍忠	贺德海
许 虹	焦东华	孔繁玲	陈小枚	郎迎洁
王晓峰	郝和国	纪国伟	胡 红	田 伟
王淑芳	钟素兰	贺秀红	殷月兰	